

真实的顾拜旦

让·迪里 著

刘汉全 译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

洛桑 2008

编写这样一本书的计划在我心中已酝酿如此之久。

我一直念念不忘，希望尽我之可能，以最明晰的方式，一丝不苟地、真实而可靠地将那些散佚的、难以寻找的基本资料汇集起来，加以梳理，以飨所有希望认识这位我称之为“著名的陌生人”的人们。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伟大尚不为人所认识。

我由衷感谢并万分珍惜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给了我实现夙愿的机会。在这漫长而短暂的旅程的终点，我似乎已用我的诚实和谦恭将这位高瞻远瞩的人物所带给我的之中一小部分回归给他，像他这样伟大的人物的事业和行动必将而且正在不断地被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发掘再发掘……

让·迪里

目录

前言	4
初步了解	5
“基本情况”	5
人生大事记	8
I. 九个方面	12
组织家	12
教育家和青年益友	16
历史学家	22
体育人.....	25
奥林匹克人.....	32
记者、撰稿人和报人.....	49
作家.....	54
唯美主义者.....	56
人道主义者.....	61
II. 问题的时代?	70
顾拜旦和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界.....	78
不胜枚举的语录中的三则.....	86
了解顾拜旦.....	87
A. 通过其著作了解顾拜旦.....	87
B. 著作目录.....	89
C. 对顾拜旦生平及其事业的研究.....	90
D. 围绕顾拜旦.....	95

前言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CIPC）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向中国读者介绍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法国人顾拜旦的生平与作品。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委员会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2007年末，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大力支持下，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通过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发行了顾拜旦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私人传记——《奥林匹克回忆录》的中本版。

2008年5月，我们又携手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顾拜旦选集的中文版。这部选集涵盖了顾拜旦的整个创作生涯，收录了他各个时期的演讲与作品，从他1892年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开始，一直到1936年他逝世的前一年为止。

而本书则出自法国的顾拜旦专家学者、知名作家让·迪里的笔下。他同时还担任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的副主席。让·迪里以简洁的笔触，撰写了这部围绕顾拜旦生平、理念以及成就的重大问题的参考书。

本书第二章主要围绕关于顾拜旦生平的重要问题展开，作者做出了相应回答。毫无疑问这些问题还将获得新的注解，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必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史揭开辉煌壮丽的新篇章。

顾拜旦生前一直梦想着奥运会可以在亚洲举办。1936年12月1日，在一篇其创作生涯最后阶段发表的文章中，顾拜旦曾写道：“……源自希腊大地的奥林匹克圣火薪火相传，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而将之交付于远东的时刻，业已降临！”（皮埃尔·德·顾拜旦：《奥林匹克精神浸润亚洲》，摘自：《体育画报杂志》，1936年12月1日，第1页。）

我们衷心期待并祝愿交付于北京的奥运圣火，能够按照奥林匹克理念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初衷与夙愿，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而和平的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诺伯特·米勒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主席

初步了解

“基本情况”

皮埃尔·德·顾拜旦

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革新者

1863年1月1日——1937年9月2日

这样的简介会引起讨论吗？

这位在每次奥运会举行时都会被全世界提及的人物，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也一直是一个“著名的陌生人”。他的人生，他的思想，他的事业，是怎样的呢？

这位理想主义者身材瘦小，双目炯炯有神，讲话声音细而尖——我们从他的广播讲话录音中可以听出，浓密的小胡子下面常常露出狡黠的微笑。他实现了他的许多理想。

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棵参天大树遮挡住了他所出版的12000页到15000页的鸿篇巨制，他所撰写的1350种到1400种的书籍、小册子、文章、讲演稿等。他之所以有如此的作为，是因为他的“精神的飞机”将他带出了墨守成规的航线，是因为他没有，远没有将自己禁锢在所谓正规的结构与道路上。按照他所喜欢的说法，他是“一个尖兵”，总是远远地冲在时代的前面。

这本《真实的顾拜旦》希望能够首次以一种方便理解，方便查阅的形式，

集基本理念、精妙引言、参照基点之精粹，呈献给大家。

本书开篇即有几个参照点，几个关键问题。

- 他没有首创名言：“重在参与。”这句话是 1908 年 7 月 24 日于伦敦在英国政府举行的晚宴上，他在致词中提到的：“星期日，在圣保罗教堂为运动员举行的仪式上，宾夕法尼亚主教精辟地指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重要的不在于夺冠，而在于参与。’先生们，让我们记住这句箴言吧！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凯旋，而在于奋争；人生的精髓，不在于征服，而在于勇敢拼搏。”
- 他没有首创格言：“Citius · altius · fortius”。这句“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原来的排列顺序为 Citius · fortius · altius，更快、更强、更高，强调精神含意），是阿奎埃尔中学校长迪东神父给新成立的学生体育协会的题词。顾拜旦将其选为奥林匹克主义的格言，因为这与他的思想相吻合。他认为体育和奥林匹克主义应该是奋斗和“自由释放”的领域。（《奥林匹克回忆录》，1931）
- 与人们太过经常、武断而不准确的认定相反，他不是僵硬的、狭隘的、教条的“业余体育”的支持者。
- 而另一方面，早在 1890 年，他就曾用这样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话语表示过：“让我们继续……继续我们的改革吧……让我们努力实现我们的计划吧。这个计划可以概括为两个词：**自由与体育**。”（《大西洋彼岸的大学》）
- 1894 年 6 月 23 日晚，在恢复举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则正式通过后仅几个小时，他便在讲演中用六个字概括了这一尝试的内涵和意义，并将这一

尝试纳入了利用体育这一可以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新的杠杆来深刻改革教育的进程中。这六个字是：“**我们是叛逆者。**”

-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肆虐之际，顾拜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像体育运动的开展一样，知识领域的大门必须向全人类敞开：“**打开圣殿的大门吧……这是人类前途的需要。**”（《历史与批评的篇章》，第三分册，第1-2页，后收入《文选》，1933年，第120页）
- 在他个人生命的轨迹临近终点时，尽管历尽沧桑，他仍然不忘激励那些“喜欢人们同他们谈论未来”的青年们，以从未曾消沉过的勃发的精神寄语年轻人，希望他们保持“**不可战胜的勇气和永不放弃的希望**”。（《文选》，1932年在洛桑大学庆祝他70周年生日活动上的致词）

这本《真实顾拜旦》以袖珍版式将事实和引语汇编成集，对他未果的创举和他的弱点，对一些人提出的疑点和质疑，亦不隐讳。

简言之，本书希望能够帮助您通过近在咫尺的观察，对皮埃尔·德·顾拜旦建立和形成您自己的认识和研判。

顾拜旦不是神话人物，而是血肉之躯的真实人物。他一生历尽人世坎坷。世人对他的了解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少。比如，他曾无数次奔波于国内外，而知此者甚少。不管怎样，依据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终于为他74年的人生——后人终会延续的人生，设立了基本参照标。

人生大事记

- 1863年** 1月1日，晚5时许，夏尔·皮埃尔出生于巴黎七区乌迪诺街20号。他有两个哥哥：保罗（1847-1933）和阿尔贝尔（1847-1913），一个姐姐：玛丽（1855-1942）。父亲是夏尔·路易·弗莱迪·德·顾拜旦男爵（封地位于舍沃罗兹河谷），宗教画画家，母亲是阿嘉特·玛丽·马塞尔·吉古·德·克里斯诺伊（科地诺曼底的米尔维尔城堡随嫁而来）。
- 1867年** “公共生活的最初记忆”，巴黎万国博览会举行。
- 1874年** 沃吉拉尔中学就读一年之后，转入马德里街耶稣会的圣伊纳斯教会学校学习6年。1878年到1879年，听过卡隆神父亲授的修辞课：
- 1881年** “他没有教给我体育，但是给我灌注了古希腊文化。”（《马德里街走读学校校友会公报》，1937年7月7日）他后于1887年成为此校友会主席。
- 1880年** 获文学业士学衔。
- 7月**：随父母前往迪罗尔，造访尚博尔伯爵（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五的直系后代，正觊觎王位）。伯爵给他留下恶劣印象。他决心与他所处的支持王朝复辟的阶层分道扬镳。
- 1881年** 获科学业士学衔。父母希望他进圣西尔军校，他未听从。
- 1882年** 攻读法学，并进入政治科学自由学校学习。
- 1883年** 于勒阿弗尔登船首次前往英国旅行。

- 1885 年** 获法学业士学衔。
- 1886 年** 长时间逗留英国及爱尔兰（10 个月）。
- 1887 年** 支持共和法国。
- 1888 年** 5 月：未经本人参选，直接被选入米尔维尔市议会，任期至 1892 年 9 月。
- 7 月：参加促进法国体育的运动。
- 1895 年** 3 月 12 日与玛丽·罗堂结婚，婚礼以改革的宗教仪式在夏伊奥圣彼尔教堂举行。玛丽·罗堂出身阿尔萨斯的一个新教家庭，世居闵斯特河谷，拥有吕当巴赫城堡。男爵夫人 1963 年于洛桑逝世，享年 102 岁。
- 新家安在十六区弗朗德兰大街 10 号，同时在乌迪诺街保留了一间书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居。
- 1896 年** 儿子雅克出生，2 岁时患日射病（？），一直未痊愈，终生过着平淡的生活，1952 年去世。
- 1898 年** 《致勒阿弗尔区选民的信》彻底表明顾拜旦无意涉足政界。此前他已于 1889 年和 1893 年几次拒绝吁请他出山从政的呼唤。
- 1902 年** 女儿蕾妮出生。她身材纤细，感情细腻，生活在她母亲鲜明的个性和她对父亲的挚爱之间，1952 年去世。
- 1907 年** 顾拜旦的母亲逝世（生于 1823 年）。

- 1908 年** 父亲夏尔·弗莱迪·德·顾拜旦逝世（生于 1822 年）。
- 1914 年** 时年 51 岁的顾拜旦希望报效国家。法国政府——一度设在波尔多，
至 或者严格地说政府的某些部长交给他多项辅助性任务，使他得以在
1918 年 战争的大背景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受公共教育部长阿尔贝·萨
罗的委托，他视察了巴黎的中学，随后又“跑遍全国，[特别是南方]”。
（《奥林匹克回忆录》，第 149 页）[参阅：教育家]。受外交
部长泰奥菲尔·代尔卡斯的委托，从 1914 年 8 月到 1915 年 10 月，
他准备了一份关于组织全国性宣传的报告。1916 年 1 月，经又一次
努力之后，他参加了部队，被任命为“翻译官”，但是几经请求，
却始终未被派往前线，后为费利浦·贝泰洛成立的“出版社”工作，
整理各种资料[参阅：历史学家]。1916 年去过马德里后，他为拉
丁美洲做了大量的工作[参阅：组织家]。
- 1920 年** 乌迪诺街 20 号的家族宅邸在这一年或是在 1922 年被卖掉。
- 1922 年** 定居瑞士洛桑。主要住在旅馆居室里，仍经常旅行（例如 1926 年
去巴塞罗那，受到热烈欢迎）。
- 此间，他已全身心投入他的理想、计划和组织中去。他个人的财产
受到战争的极大损害，俄罗斯-罗马尼亚的崩溃给予他沉重的打击。
1929 年底，洛桑市政府将梦荷泊别墅三楼居室提供给他永久使用。
- 1930 年** 米尔维尔城堡被其兄长保罗卖掉。
- 1932 年** 朋友们在洛桑为他 70 岁生日祝寿。

- 1934 年** 秋天，顾拜旦住进日内瓦贝尔蒙 12 号美罗丝公寓，以后一直住在这里，同时保留着梦荷泊居室的使用权。
- 1935 年** 8 月 5 日，立下遗嘱：“8 年以来，我命途多舛，屡处逆境，财源枯竭，入不敷出，致使在我临终之际，陷我亲人于困顿，前途难卜。”
- 1936 年** 年初，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提议授予顾拜旦诺贝尔和平奖，此议未果。
- 1937 年** 3 月：无法按计划赴马德里街校友会参加每年一度的宴会。
- 6 月 22 日：**从 1932 年春一直延至此日，洛桑市将荣誉市民称号授予了这位“忠实的朋友，他卓越而无私的创举为法兰西精神所特有的博爱思想在世界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 9 月 2 日：**在日内瓦莱蒙湖左岸拉格朗热公园的一条甬路上，皮埃尔·德·顾拜旦倒下了。
- 1938 年** 他的心脏被放在奥林匹亚他曾于 1927 年参加其落成典礼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复兴纪念碑的里面。
- 1944 年** 5 月 19 日和 20 日，他的私人藏书——他的研究工作的直接源泉，由洛桑图书同业公会拍卖，散逸四方。
- 1964 年** 法国政府错后一年组织了她的百年诞辰庆祝活动。
- 1994 年** 3 月 22 日，皮埃尔·德·顾拜旦大街命名。此街位于巴黎让蒂伊门附近，从法国体育之家延伸至夏勒蒂体育场。

I. 九个方面

人物、事业、生活，三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那么如何才能将如此错综复杂的一种行为和一种事业的不同方面清楚地表现出来呢？

这里采用了这样的方法：按他兼具的组织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体育人、奥林匹克人、报人、作家、唯美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等九种身份，将构成整体的这九个不同方面分离出来，逐一观察研究，排出大事年表，指明立场和态度，引证标有准确出处、理应最能说明问题的原话。

顾拜旦的文章是相互呼应的，甚至经常是重叠的。如果我们将繁杂的文字进行归纳和对照，我们便能理出头绪，看清脉络。因为他的著作是一个整体，他所关注的，他的思想的主轴，都具有罕见的持久的一致性。

组织家

顾拜旦远非局限于单纯的思想建设，远非局限于多少有些清高的理论研究，而是一直在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活动。这或许可以说是他最鲜明的特点。从这个视角上观察他的事业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这位集教育、体育、奥林匹克主义为一体的思想家与脱离实际的空想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所成立的组织——或存世长久或昙花一现，数量多得惊人。为了落实他的诸多想法，他总是事必躬亲，全身心投入。

1888年 5月29日：“推广身体锻炼教育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1887年8月30日刊载在《法国人报》上的他的一篇文章曾对此做过预报。成立大会6月1日举行，顾拜旦特请知名人士、前公共教育部长儒尔·西蒙担任大会主席。10月14日，记者帕斯夏尔·格鲁塞推出他的“全国体育教育协会”——其倾向性比英式体育的拥护者更“左”。此协会开场热闹了一阵之后，并未像“联合会”一样坚持下去。“联合会”因为与德·圣克莱尔和顾拜旦关系密切而得

到加强[参阅下文]。为了使学生的体育协会加入到“联合会”中，他同意放弃成立“学生体育协会”的想法，不过后来又感到后悔。1890年至1891年，“委员会”逐步渗入到“联合会”中。

1889年 2月：顾拜旦担任书记(?)的“法国争取学校教育改革协会”召开首次会议。

6月：“国际推广体育大会”于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在圣贝尔街的路桥工程学校举行，他是其核心和秘书长。同月**15日**，他发表了对包括殖民地在内的英美世界的大、中学校的调查报告，明确表示他“**对未来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1890年至1893年 作为“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USFSA)的秘书长，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他写道：“我[1892年]4月28日在特洛瓦，5月28日在布尔格，6月5、6、7三日在卡昂，16日在亚眠，30日在芒市，10月25日在波尔多。”(《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69页)[参阅：体育人]。他是在1890年4月底和6月6日之间接任此职的。当时儒尔·马尔卡代大度地让出这一职位，转任副秘书长和技术委员会书记。顾拜旦在此位置上一直尽心尽力地工作到1899年，为这一年轻的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

1894年 担任“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总理事长，此会后改名为“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参阅：奥林匹克人]。他为大会制定了会议、接待和庆祝活动的详细计划和日程，特别精心设计和组织了**6月16日**在索邦大学大阶梯教室里举行的开幕式，成功地使整个大会一下子就浸入到一片深受热烈拥护的气氛之中。

- 1897 年至 1925 年** 他组织、或以他为主组织了 1897 年、1905 年、1906 年、1913 年、1914 年、1921 年、1925 年等历次国际奥委会会议和奥林匹克代表大会 [参阅：奥林匹克人]。
- 1903 年** 为实践他 1920 年 3 月 2 日在报告会上所提出的“新体育教育形式”的主张，他创立了“实用体操协会”，此组织后于 1905 年更名为“大众体育协会” [参阅：体育人]。
- 1906 年** 与天文学家儒尔·让桑等著名人士一同创建“教育改革协会”。儒尔·让桑曾于 1892 年 11 月 24 日在莫东天文台的平台上为庆祝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而组织的越野赛跑的参赛者举行盛大招待会。在 1908 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加布里埃尔·里普芒的关注下，顾拜旦为此“教育改革协会”制定了《新学校教育大纲》 [参阅：教育家和青年益友]。
- 成立旨在加强两国接触的法国—罗马尼亚联盟（?）。
- 1911 年** 10 月 27 日，“全国教育联盟”在索邦大学召开全体协商会议，全文通过顾拜旦计划，此计划建立在“英国在童子军名下所组织的青少年小团体体系”之上。法语采用“*éclaireurs*”一词表示童子军。此联盟要求自身行动具有：知识性、体育性和道德性（《全国教育月刊》，1912 年 1 月 15 日第一期，第 2 页）。此联盟取代了“大众体育协会”，特别是接管了它的“能力证书”的发放权 [参阅：体育人]。
- 1912 年** 11 月 20 日联盟在地理学会大会堂为欢迎顾拜旦举行了庆祝活动，之后，联盟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成立“全国宣传部（SPN）”。

1913年1月出版的《全国教育月刊》所刊载的第一期全国宣传部（SPN）公报，显然出自顾拜旦的手笔，至少是按照他的意思撰写的。全国宣传部的缩写SPN后发展为“全国宣传学会”的缩写[参阅：体育人]。

1914年 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与体育日报《汽车》报社社长亨利·代斯格朗热一道创立了“体育教育委员会”。

1916年 创立“历史研究推广委员会”。

顾拜旦在里昂主持首届“拉丁美洲周”。

1917年 创立洛桑“奥林匹克学院”。1917年3月—7月，1918年1月—4月，1918年10月和1919年2月—3月，举行多期活动。

1925年 11月15日，在艾克斯-昂-普罗旺斯成立“全面教育联盟”。本着顾拜旦一贯倡导的“间歇性”原则，该组织1930年底自行解散，“仅保留了负责传播其原则与方法的宣传技术委员会”（《未来城市的基础》，1932年，第3页）。

1926年 9月14日至18日，在乌希为全面教育联盟（UPU）组织了关于“现代城市的教育作用”的国际会议。会议肯定了人类的“体育权”和参与一般文化活动的权力。

1928年 成立“国际体育教育组织”，该组织后于1930年提出《体育改革宪章》——顾拜旦时年67岁。

顾拜旦邀请宾客参加他身边各类活动的请柬大部分由他本人亲笔书写，他一

直在力争摆托“打字体”这一“令人难以忍受的桎梏”（《奥林匹克回忆录》，1932年，第110页）。

在他一生书写的成千上万封书简中，这类邀请函占了很大一部分。

教育家和青年益友

和整个同代人一样，顾拜旦深受1870-1871年战争的灾难和“悲惨”的影响（《第三共和国时代法国的演变》，1896年，第22页），他想帮助这个被德国打垮的法国重新站立起来。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教育。

他从一个非常具体的活动领域出发，将体育引入中学，展开全面分析，从根本上对整个教育体系提出质疑。

他的大部分事业是致力于青年教育。直到晚年，他仍在热情地激励青年。

早年的（？）一段文字似乎清楚地概括了他的思想：“我要通过体育重新锻造这弱不禁风和闭门不出的一代青年，使他们强健体魄，磨炼性格，不畏风险，也无惧暴力。我要通过他们与恒星、行星、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等广阔境域的接触，开阔他们的视野和增强他们的理解力。这些广阔的境域孕育着相互尊重，将成为实现国际和平的酵母。这一切是为了所有的人，不分出身、种姓、财产、地位和职业。”这段具有真知灼见和预言性的惊人之语见诸玛丽-泰蕾兹·埃康的著作《皮埃尔·德·顾拜旦，奥林匹克诗史》（1966年，第58页），引文出处仅标示为“未出版的手稿”，依据似乎不够充分。据我们所知，“未出版的手稿”的作者一直未被确认，所以宜以没有争议的已出版的材料为据。

1883 年
至
1886 年

在英国的几次逗留使得顾拜旦很快发现了“这一意想不到而隐秘的事物：体育教育；[……]一个完整的道德和社会的教育方略蕴藏在学校体育之中”（《二十一载体育奋斗》，1909 年，第 2 页）。他深受被视为是托马斯·阿诺德的思想的启发。托马斯·阿诺德长期担任拉格比（Rugby）公学的校长，治校有方，但无著作留世。顾拜旦认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言行总是本着这样一种信念：少年用身边的器具自己锻造自己的刚健，这种刚健的锻造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不能由他人越俎代庖。”（同上，第 2 页）

1886 年

11 月 1 日，在弗里德里克·勒普雷的竞争者主办的刊物《社会改革》上，顾拜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英国的中学，哈罗中学》。他在政治科学自由学校上学时曾接受这些主办者本人的教诲 [参阅：人生大事记]。

1888 年

3 月阿谢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英国的教育，中学与大学》，这是准备分三年编辑和出版的三部著作中的第一部。顾拜旦在这部著作（327 页）中总结说：“必须在法国的教育中为体育辟出一席之地。这是我的基本结论，可能会显得格格不入。”

5 月 29 日，召开关于“巴黎各中学负担过重的纠正办法及其变革”大会。

- 1889 年** 出版《英式教育在法国》(207 页)。
- 1890 年** 出版《大西洋彼岸的大学》(281 页)。这第三本著作是他受托在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考察的成果。时任公共教育部部长的阿尔芒·法利埃尔——后为共和国总统,于 7 月 7 日委托他进行此次考察。考察期间他参加了波士顿体育代表大会。
- 顾拜旦的文章、倡议、讲话接连发表[参阅:组织家],反映了他越来越接近“全面教育”的思想。这种教育必然要导致“教学改革,特别是中学教学的改革。改革将是彻底而慎重的”。(载于 1937 年 7 月 7 日马德里街走读学校校友会《公报》的文章)[参阅:人生大事记]。
- 1901 年** 出版《公共教育札记》(320 页)。
- 1906 年** 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制定《模范中学》计划书。该计划书全文后于 1912 年印成单行本(23 页)。
- 1910 年** 制定《新中学教育大纲》(31 页)。《大纲》思路明确,脉络清晰。首先是科学学习,从恒星世界开始,到法律和防卫结束;其后是人文学习,即历史学习;最后是语言学习,学习已不再使用和正在使用的语言。
- 1912 年** 在 1905 年出版《体育教育》(三卷本《20 世纪青少年教育》

之首卷)之后[参阅: 体育人]和1915年出版的《道德教育》之前, 顾拜旦出版了《智能教育: 普遍分析》(155页)。本书序言指明了思考力所经过的历程和所达到的深度。顾拜旦对教育体系的根基提出质疑, 他认为必须将中学教育阶段变为“一个将物质世界和人类发展集为一体的全面思想形成的阶段, 以便使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在踏入人生道路之前, 对他们所享有的, 同时也因此而负有责任的先世的遗产有一个认识”(第13页)。知识的并置, 知识的累积, 只是一个酵母。“彻底改变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用分析法代替综合法——已经流产的综合法”。

1915年

在洛桑出版向公共教育部长提交的报告《体育教育的改进与发展》。

1921年

出版《体育教程》(124页)[参阅: 体育人]。

起初, 他只是由于想到自己国家的青年才踏上这条道路的。1920年(《二十一载体育奋斗》, 第2页), 他提到过, “从他踏上这条道路起, 从他记忆所及的那个时候起, 他便认定, 只是在这里, 在一种修正的、进化的、能够产生集体的冷静和思考力的教育之中, 才存在着医治教育的灵丹妙药”。如果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的话, 他的视野则已扩展到国际的范围了。

1925 年

当顾拜旦决定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他借布拉格奥林匹克代表大会的技术及教育会议召开之际，表露了心迹。在既是开幕词也是告别词的大会致词中，他表述了一贯坚持的路线：

“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竭尽所能地推进和加速一个紧迫事业的完成：让一种能够培育清晰的头脑和难得的冷静教育生根开花。”

1926 年
至
1929 年

顾拜旦 1925 年底宣告成立的全面教育联盟接连四年出版了 4 本重要的“手册”。正是为此联盟，他在 1926 年确定了他称之为“十支光火炬”的最终形式，这一形式是依据他所赞同的并在他作为教育家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加以发展的一种知识结构类型而确定的，他最初定为“六支光”，后又曾定为“七支光”。

“全面教育联盟宪章第三条宣告，以基本知识教育代替行为教育，据此联盟将以下十种基本知识的掌握（因能力和可支配时间的不同而在不同程度上的掌握）视为所有人皆应拥有的基本教育的基础：

- 限定个人生存本身的 4 种基本知识：
天文学、地质学、历史学和生物学；
- 个人智能和精神赖以发展的 3 种基本知识：
数学、美学和哲学；
- 最后，在个人社会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的 3 种基本知识：

经济学、法学和人种学及语言学。”

（收入《文选》，第 173 页）全面教育联盟的工作于 1930 年以一份《总报告》的编写而告终 [参阅：组织家]。

事实证明，这样的认识并不错：他对青年关怀备至，而他自己也作为青年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当已经多有建树的顾拜旦提出恢复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他自己也只有 30 岁 [参阅：奥林匹克人]。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1918 年**，他还敏锐地指出，“要想对青年人施加影响，就必须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兴奋点”。（《当前我们能对体育提出那些要求》，2 月 22 日洛桑自由希腊人协会会议上的讲话）

1927 年，他于 4 月 17 日从奥林匹亚发出了重要的致函之一：《致各国体育青年》 [参阅：奥林匹克人]。

1932 年，在洛桑大学他的 70 岁生日庆祝活动中，他拒绝回到过去。“青年喜欢人们同他们谈论未来，他们做得太对了！如果有机会同他们交谈，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是那些垂暮之年发出的声音，那些历经沧桑或饱尝艰辛的老者的声音，语重心长，更值得他们倾听。语重心长，我要说的就这个意思。[……]。鼓足勇气！满怀希望吧！[……]。坚持下去！[……]。勇敢地穿过风雨，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这充分说明青年和教育是他毕生思考的中心。

历史学家

“我一直在向你们宣扬体育和历史，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之多。你们听到了体力与智力结合的源泉——体育文化的呼唤[……]。可是你们没有听到历史文化的呼唤。你们不要以为我已心灰意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不断地发出这样的呼唤。”在1915年10月4日为《艾克赛尔肖日报》撰写的系列文章之一篇中，顾拜旦如是说。

在很早的时候，他对各种现象的观察和理解就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眼光，也正是在历史的背景上他产生了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在1935年广播的公开信中[参阅：奥林匹克人]，他最后一次概括和总结了他所认为的奥林匹克主义的历史依据，并明确指出这一历史内涵在他看来是一种具有何种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我希望[……]在围绕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的文化活动中，历史将占有的一种可与诗歌相媲美的重要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奥林匹克属于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凭借的就是历史的光辉。历史也是和平的可靠保证。要求不同国家的人民相亲相爱，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但是要求不同国家的人民相互尊重，却并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要相互尊重，就首先要相互了解。像这种可以按时代和地理的准确比例进行普及的世界历史，是奠定真正和平的惟一真正基础。”

他的很大一部分的思考和研究——所依据的参考资料多一半是历史著作（就像1944年5月19日和20日在洛桑拍卖的藏书清单所显示的那样），以及他所取得的成果，都在专业历史学家的工作范畴之内，这使得那些未曾有机会接触他所出版的著作的人士大为感慨。

1888年 9月：在诺曼底米尔维尔附近的布尔贝克小镇举行了关于《法国

和欧洲》的讲座。

- 1895 年** 在勒阿弗尔举行了 5 场《现代史》通俗系列讲座。
- 1896 年** 出版《第三共和国时代法国的演变》，(432 页)，汇编了在《新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译成英语分别在美国（1897 年）和伦敦（1898 年）出版。
- 1897 年** 《世界性的生活能否导致国际友谊？》，这篇文章刊载在《评论杂志》(The review of Reviews) 4 月号上。顾拜旦通过此文比以往更加明确地将他经常使用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种基本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的标志。
- 1898 年** 从 11 月开始，在《比利时独立报》连续发表题为《欧洲的未来》6 篇系列文章，后在布鲁塞尔出版单行本（1900 年，48 页）。1900 年，他又在此报上发表了主要是关于历史研究的 52 篇文章。
- 1899 年** 《1814 年以来的法国》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书中汇集了他两次为《评论半月刊》(Fodrtnightly Review) 撰写的文章共 7 篇。
- 1900 年**
至
1906 年 由他主持编写的《法国编年史》逐年出版，此为七大册的现代史的鸿篇巨制。
- 1901 年** 早在《公共教育札记》出版之际[参阅：教育家]，历史教学便在他深化教育改革观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1916 年** 在大力进行“国民宣传”时，顾拜旦编写了各种小册子，用以构成一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法国》，特别是了解其历史的丛书。这些文字后于 1930 年收入《我们的法国》(206 页)。

1917年 在巴黎推出“历史研究委员会”，设有包括爱德华·埃里奥在内的5人提议委员会。

在洛桑瑞米宁宫蒂索厅举行6次《关于第三共和国的历史的讲座》（1870年-1914年）。

1919年 先在洛桑的人民之家，后在卢森堡，再后在米卢斯，顾拜旦在他的讲座中多次揭示了“世界历史”[参阅：下文]。他明确阐述过“世界历史”应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历史在现代学校中应该占有哲学在古城墙内占有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历史的无知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历史是所有人都可以看明白的。当历史摆脱掉充斥其中的虚构、故事、战况、传说等赘疣，而回归到大的轮廓，回归到基本事实的时候，历史便一目了然，很容易供人们借鉴了。”（《奥林匹克学院简介》）

1923年 《欧洲向何处去？》（31页的小册子），收入1918年-1919年在《日内瓦论坛》上发表的文章。顾拜旦在这些文章中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1926年至1927年 由“世界史学会”牵头，皮埃尔·德·顾拜旦出版了附有索引的四册《世界史》。这部著作表现了他的学识的博大精深和惊人的比较能力，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被推荐和提供给师范院校使用。本书前言提出了编写此书的“最高原则”：“不能出于对地区和利害关系的考虑而牺牲对真正的时空的均匀的尊重[……]世界史必须成为‘全面的整体’科学。”据此，本著

作的4个部分充分表现出作者纵观全局的广阔视野和综合与概括的强烈意识，广泛涉及到亚洲的帝国，地中海的悲剧，凯尔特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以及当前的民主的形式和发展等。

1934年

在6月23日洛桑大学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四十年奥林匹克主义》，始终如一的顾拜旦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结束了他的答词：“1919年，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庆祝活动上，我在致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答谢词中曾说过，‘时事还十分艰难，初露的曙光还只是明天黎明时的暴风雨之前所显露的一丝曙光。但是，临近中午时必将艳阳高照，黄澄澄的麦穗必将沉重得让收获者抱都抱不动’。可是，先生们，现在还不是中午。历史的岁月是漫长的。请耐下心来，抱定我们的信念吧！”

体育人

没有什么注定会使这个出身贵族的孩子选择这个至少在当时看来颇为怪异的活动领域：“体育”。他是在开始抱有教育家的志向时，被引向了体育领域。与人们可能想象的相反，他并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体育人。他是一个实际参加体育锻炼的实践者。正是这样，他亲身感受和理解到体育在个人的构建中所能带来的内在的东西，由此而使他坚定不移地大力推崇一种竞争的和“富有激情的”体育。

当时法国青年所缺少的，“就是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所构成的那种培养意志的苗圃[……]。你们知道，我曾怎样竭尽全力地冲破门禁，或是进而让学生们从内部冲破门禁，使体育深入中学的校园中”。（关于《奥林匹亚》的讲座，1929年，巴黎16区礼堂）因为，“像托马斯·阿诺

德所理解的这种体育，是所有国家的教育者为培养青少年坚强的精神和强壮的体魄可资利用的最好的、最积极的手段”。（《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 206 页）

1888 年 5 月，他加入了当时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的法国体育运动的先驱者的行列。其中有自 1884 年 7 月即担任赛跑俱乐部秘书长的著名人士乔治·德·圣克莱尔，还有自 1883 年 12 月 13 日成立伊始即是法国场地运动协会领导人的儒尔·马尔卡代。此二人于 1887 年 7 月 4 日成立法国赛跑协会联合会，两年后称为 USFSA，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协调机构。1888 年 7 月 4 日，顾拜旦在达弗雷城组织了校际体育会议，参加者只有蒙热学校（后来的卡尔诺中学）和阿尔萨斯学校，但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不起的成就了。

他非常喜欢进行体育活动时的感觉。除了在米尔维尔城堡乘他的“达姆-达姆”号小船荡桨外，他还打网球，骑自行车——他把他的自行车称为“朝天蹬”，因为两个脚蹬总有一个朝天；他练习马术、击剑——他说，“早在 1882 年他便与几个朋友在当时位于勃艮第大街 67 号的 J-B 剑馆成立一个小击剑协会”（《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 16 页）；他可能还进行拳击运动——先是法式的，后是英式的；他也曾从事过三轮摩托车运动。

1891 年 1 月，从他的表现上看，他已具有陪同亨利·迪东神父完成 10 公里以上越野赛跑的能力了。此时他们俩都在追逐跑游戏中扮演按当时流行说法所说的“领跑兔”的角色。后来他成立了阿格伊中学体育协会。1892 年 3 月 20 日，在巴嘎代尔的草地上，担任法国首届橄榄球锦标赛决赛裁判的，不是别人，而是……而是皮埃尔·德·顾拜旦。在他公正的执法下，法国赛跑俱乐部球队以 4 比 3 的比分战胜了法国赛跑协会球队。他为此赛事捐赠了一个由他亲自设计的奖杯——被不恰当地称作了“布雷钹盾”，上面镌刻有马尔卡代为 USFSA 题写的一句格言“Ludus pro patria 为祖国而锻炼”。

他决心“从体育中汲取体育在教育中所能提供的一切”（《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 205 页），所以坚决避免卷入那些方法之争，那些“对理性体育

这一新点金石的探讨”（《体育教育》，1934年版，第55页）。“现在有很多体系，各有各的拥护者。但是，如果说一些体系优于另一些体系，我认为这并不能说这些体系是十全十美的，当然也不能说其他体系就一无是处。总而言之，这首先应该由实行者进行评价。”（《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185页）

由于受到“损及体育的内部争论”所困扰（《公共教育札记》，第216页），他把后来将在其间推行“普通体操”的“少年时代”暂且搁置一旁，也把“青年服役前预备军事训练”暂时放到了一旁。他出版了《实用体操》（1905年，154页）。此书面对的“只是14岁正常年龄、在学校接受过普通体操灵巧性训练的男孩”（《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185页），对于“已表现出体育潜质的人”，则应因人施教，给予充分的灵活性（《公共教育札记》，第216页）。为什么对这种可列入哲学理义的体操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在“struggle for life”中，在生命的竞争中，这种体操可使工业时代的“机敏者”得到锻炼，进而获得成功的机会，工业时代是属于“机敏者”的。

1905年 1903年成立的“实用体操协会”转化为“大众体育协会”。此协会1907年6月30日在索邦大学组织了一次颁发“机敏者证书”的盛大活动，相关测试是此前在罗利昂、图尔古安、奥尔良、巴黎等地举行的。自1908年以来，共发放证书1774份。大众体育协会的纲领清楚地写在为此协会发行的邮政明信片的背面：“每个城市拥有一个足球队，每个城镇拥有带淋浴设施的一个体育馆和一个体育场，每个城市拥有一个游泳池，每有机会便组织个人马术比赛和拳击比赛，每个体操协会拥有一个合唱团，尽量减少繁文缛节、等级和徽号，没

有政治、政党和与体育无关的‘领导人’的干预。”

- 1906 年** 与路易·帕斯古一起撰写的《马上剑术》(8 页) 印发单行本。他后来一直试图将此项运动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之中, 但未果。
- 1907 年** 顾拜旦提出“现代五项运动”比赛方案(集射击、游泳、马术障碍、击剑、4000 米越野等 5 项比赛于一体, 最初他希望用划艇比赛代替射击比赛), 遭到众人反对。在 1912 年的奥运会上, 他终于将此项比赛列入大会赛程中。他认为这一项目极具挑战性, 是奥运会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 “从纯粹体育的观点上看, 现代五项运动代表了体育运动的最高峰。”(《奥林匹克评论》, 1912 年, 第 151 页) 1918 年, 他明确表达了他是多么看重这个项目: “太好了, 这是完整的体育运动, 尽管还缺少几项重要的运动项目。这种向兼项发展的整个趋势还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来得非常及时, 因为我们正在陷入一个最贫乏的专项化的泥沼之中, 就像我们在那么多的领域中所遇到的那样[……]。”(《洛桑报》, 12 月 28 日, 《奥林匹克书信之九》)
- 1913 年** 7 月, 出现“反专业化运动员的运动”, 发起者的口号是: “没有比赛和锦标, 只有过滥和腐败。”(见《体育教育》, 1934 年版, 第 54 页) 面对这一运动, 《奥林匹克评论》发表了顾拜旦的文章。他在文中针锋相对地说: “若要 100 个人参与体育运动, 就要有 20 个人专业化, 若要 20 个人专业化, 就要有 5

个人表现出具有取得惊人成绩的能力。非如此不可，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最后他以坚定的信念结束了这篇短文：

“不论现在和过去，在体育教育上，体育运动的观念都总是惟一起作用和持久的力量。如果这个力量消失殆尽，体育教育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毫无起色。”

1915年 35页的关于《体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报告竣稿。[参阅：教育家]

1916年 出版《实用体操教程》。救助-保护-运动。供相关单位、教练、军事教官使用。（47页）。

1919年 顾拜旦最初推崇体育，是因为他看到体育在培养强壮而刚健的国家精英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在，他又看到了体育的另一个可为的方面。“一切体育运动为一切人，这无疑是一种将被人们指责为乌托邦的疯狂的提法。对这样的指责我并不在意。经长久的斟酌和推敲，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恰当而可行的。我将用留给我的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洛桑报》，1月13日的《奥林匹克书信》）

他一直坚持着这个方向。无论是他以《体育教程》（1921年，124页）的形式体现出他的思想，还是1930年9月30日体育教育局出版发行的《体育改革宪章》，都是沿着同一方向的努力。体育教育局是他所成立的最后的组织之一。《宪章》还明白无误地

提出“体育与体育教育的明显区别，体育教育与体育竞赛的明显区别”。

顾拜旦强调：“体育本能具有激情性。这是十分恰当的表述。[……]当身体运动不再具激情的时候，这种身体运动就不再是体育了。”（《洛桑报》，4月27日《奥林匹克书信》）在1922年版的《体育教学》（第64页）中，他再次谈到这点，他就奥林匹克格言[参阅：奥林匹克人]发表议论说：“[体育]要求更快、更高、更强。从人类平衡的角度上看，就算这不尽合理吧！但这也恰恰是体育的崇高之处，甚而是其诗意之所在！”

《体育教程》1921年在洛桑初版，1922年在法国以《体育教学》一名重版。顾拜旦在此书序言中开宗明义，给体育做出定义：“体育是在渴求进步的激励下对强化的、甚至不惜冒险的肌体活动的有意识的和经常性的崇拜。从中引出5个观念：创新、坚持、强化、追求完美，蔑视可能出现的危险。这是5个至为重要的基本观念。由此产生三个结论：第一、体育对于人类来说并不是天然的本能性活动；第二、体育具有这样的性质：可以将各种肌体活动叠加在一起，也可以不叠加在一起；第三、体育呼唤自我控制，冷静，观察……体育既属心理学范畴，也属生理学

范畴，可以对理解力、性格和意识产生作用。故而，体育是一种完善道德和社会的原动力。”

1931年 “超越极限的自由”——他后又在**1935年**电台播放的一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这一要求，是《奥林匹克回忆录》最后几句话（第218页）的基调：“请不要指望打破这个规律而不破坏整个体育大厦吧，你们所有这些中庸的、反自然的乌托邦的信徒们，请诸君还是安静地看着我们怎样继续身体力行这句迪东神父题给他的学生而现已成为奥林匹克主义的格言吧：‘*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这也就是为什么顾拜旦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利用体育运动作为吸引人的中心，作为一切体育教育形式的动力因素。

1934年 这也就是为什么顾拜旦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置于运动员的一方，而不是运动员负责人的一方。“运动员，还有什么抨击他们的话，人们没有说出过呢？……我仍然坚持将他们的沉沦归因于家长、教师、政客、报界，以及体育联合会的领导人，而同时我也不无欣慰地看到这些沉沦尚属少见。”（《奥林匹克主义40年》，1934年6月23日在洛桑罗拉大厅庆祝现代奥运会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36年 在《划船养生法》一文（1928年6月载于《瑞士医学实践杂志》）发表8年后，在他辞世前不到1年，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还穿着运动服，赤露着双臂，乘着他的“小赛艇”在莱蒙湖上荡浆。

奥林匹克人

这里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本《真实的顾拜旦》用了很大篇幅谈论皮埃尔·德·顾拜旦这作为奥林匹克人所从事的事业，但是这不应该助长这样一种广为流传但有失全面的看法和巨大的误解：他的思想和贡献仅仅或者几乎仅仅局限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和发展上。在这一部分中，明确指出以下诸点尤为必要：顾拜旦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的确确从一开始就“全副武装”地、完整而完备地从革新者的头脑里脱颖而出，他表现出怎样的永不懈怠的热情，他所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活动并未因岁月的消磨和常年的殚精竭虑而停止或者减少——即使在他离开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时亦是如此。非但如此，他还做到了诸事兼顾，同时并举，这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名字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他的思想里，复兴奥运会原只是推广他的体育教育理念的一种手段，体育教育是他整个教育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奥运会的复兴终究得益于他的竭诚和努力，也很快地超越了狭隘的国家利益的考虑。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想到奥林匹亚的人。他自己就曾提到，督政府有可能想过在战神广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并未找到支持此说的真正线索。这些时隔久远的事暂且不提，就说19世纪，即已充满这类尝试，各种奥运会屡见不鲜。1832年2月在格勒诺布尔附近的隆多创立了一个多明我修院学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一直办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才终止，亨利·迪东1894年曾在此运动会上获过奖。在古斯塔夫·约翰·沙尔图教授的推动下，在朗诺萨的斯卡尼亚（瑞典）组织过奥林匹克运动会（1834-1836）。大约在1849年，布鲁克斯博士于穆赫-文洛克组织了奥运会，他后于1890年10月还热情地

接待过顾拜旦，文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是 1894 年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之一[参阅下文]。英国人在伯明翰或惠灵顿也进行了类似尝试，但是没有什么结果。扎巴福音会曾于 1859 年、1870 年和 1875 年赞助过在希腊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是这些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面对国内的，当然不会具有什么规模，当时体育运动还未得到广泛发展。1880 年，帕斯卡尔·格鲁赛以菲利普·达里尔的笔名在《时代报》上发表了一些专栏文章，他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鼓吹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就是这个词，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是民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编入《身体的复兴》一书中。

现代体育有了生命。“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古希腊诗人平达所赞颂的、公元 2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博萨尼亚所详加描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不可磨灭地留在人类记忆中的绝无仅有的几个词汇之一。平心而论，无可争论的是只有顾拜旦一人以他的微笑，以他的坚忍不拔，以他的卓越才能创建了这个真正的国际组织，使得一个有生命的、建筑在可提供持久存在的的机会的基础之上的组织机构落地生根。

189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多少有些假托成分在内的 USFSA 成立 5 周年庆祝大会在老索邦大学陈旧的阶梯教室里举行[参阅：体育人]。乔治·布尔东、瑟朗——后来的法国驻维也纳大使、以及顾拜旦，分别做了关于体育史的讲演。顾拜旦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些足以激励我从现在起就考虑我的计划的第二部分。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此方面给予我大力支持，就像你们一直给予我支持一样。我希望能和大家一道，在符合现代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继续实现这一宏伟壮丽而功德无量的事业：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艰难的道路，提出这个建议？事情是明摆着的，对于这样的建议，人们即使不是普遍地冷漠，也是非常地不理解。他在《二十一载体育奋斗》

(第 89 页) 中解释说：“因为在法国，只有来自外部的竞赛才能有效而持久地产生影响[……]。必须保证这些接触具有一种周期性和一种不争的声誉。将这些接触建立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不就是复兴奥林匹克主义吗？这个词本是我所熟悉的。在古代历史中再没有什么比奥林匹亚更我心驰神往了。”

1893 年 8 月，顾拜旦坚持向 USFSA 委员会提出关于体育业余性问题的代表大会的预备性议程，此议程是阿道夫·德·帕里索以前草拟的，最后一项是这样写的：“VIII.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恢复举行的可能性。可在何种条件下恢复举行 [……]？”

1894 年 1 月 15 日，他向国内外发出召开“巴黎国际体育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倒数第二段明确指出：“在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符合现代生活要求的前提下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将使世界各国的代表们四年一度共聚一堂。我们有理由期待，奥林匹克和平勇武的竞技精神，将成就国际主义的旷世之举。”最初没有任何热烈的反响。顾拜旦加紧奔走，用他漂亮的斜体字书写了更多的信函。作为几个王室家族的荣誉成员，他得到了一些王族的支持。后来形势有所改观。

6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 4 点，近 2000 人出席了在索邦大学大阶梯教室举行的关于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开幕式，这个会议名称是在大会召开前不久确定的。顾拜旦对大会的每个细节都做了考虑，会议进展顺利。76 名与会者代表了

12个国家和49个体育协会。这些国家有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俄国和瑞典。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惟一的一名德国代表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的，这就避免了法国体操运动员的抗议。工作会议分别由两个专题委员会主持：一个委员会负责体育业余性的问题，另一个负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问题。由这位“小男爵”制定并出资支持的议程兼具社交性和体育专业性，令与会者欢欣鼓舞。23日，在索邦大学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恢复举行的决定，未受到任何阻挠。会议期间，顾拜旦提请大会通过了诸多相关原则：奥运会四年举行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应具有现代性、中小学学生不得参加——有人希望加入儿童比赛项目组成14人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不同国家轮流举行运动会等。顾拜旦原希望第一届奥运会借巴黎万国博览会之机于1900年在巴黎举行。但是代表们改变了他的想法。他们主张在1896年举行首届奥运会。在什么地方？似乎是在希腊人维凯拉斯的支持下，顾拜旦在19日的会议上提议雅典作为举办地，此议立即被一致欢呼通过。1894年6月23日晚，“今晚，电波会把这则消息传至四方——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主义，在历经千百年的黯然失色后，而今终于又回归世界”，顾拜旦在室内动物园游廊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这样讲道。他在致词中还向“代表大会的参加者”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这次代表大会实现了我奋斗人生的第一个十年的夙愿”，他说。

11月，一切都还远未落实。顾拜旦登陆希腊。他了解到特里库皮首相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反对奥运计划。虽然如此，他还是说服了一部分舆论，并争取到反对派领袖德里亚尼斯的支持。当月12日他提出一份十分完整和非常现代化的比赛项目表。他在雅典帕

纳斯协会举行了报告会，最后朝圣了奥林匹亚。他回到法国后，希腊的形势有所变化，王储康斯坦丁的态度使天平向有利于举行奥运会的方向倾斜。当时是康斯坦丁摄政，希腊国王正在俄国参加亚力山大三世的葬礼。特里库皮对这一抗拒自己的行为极为愤怒。他的内阁于 1895 年初倒台。

1896 年

4 月 6 日，希腊国王乔治一世宣告：“我宣布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这个句子后来成为奥运会仪式的固定表达方式。国王话音一落，礼炮轰鸣，放飞的鸽子欢快地飞翔在运动场的上空。运动会的比赛进行了巨大的改革，汇集了田径、体操、搏击、水上、自行车等各种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比赛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12 个国家的 81 名运动员与希腊的 230 名运动员在 9 个大项的 43 个单项比赛中同场竞技。比赛设有“马拉松赛跑”一项，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布雷阿尔在 1894 年代表大会后提出并设立的。本届奥运会创立了一个仪式：每当选手获胜，都在代表荣誉的旗杆上升起获胜者所属国家的旗帜。奥运会取得如此之大的国际成功，以致希腊人开始希望将这 4 年一次的运动会永远留在希腊。面对希腊人的逼迫，顾拜旦顾左右而言其他。

他在忧虑而冷静地等待着风暴的平息。在 4 月 15 日的闭幕式的当天晚上，他向报界公布了致希腊国王的一封公开信，宣布将由他本人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按照最初制定的原则，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职由应届奥运会举办国的人士担任，为此，巴黎代表大会委任了泛希腊体操协会的代表德米特里斯·维凯拉斯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经常住在巴黎的巴比伦街），这时他已担任此职两年。顾拜旦在公开信中说：“两年前，在巴黎体育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陛下曾屈尊给我发来贺电，大加鼓励。我现在可以欣慰地告语陛下，我的愿望已告实现，奥林

匹克运动会已经恢复。陛下作为恢复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席，给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这样的权力：衷心希望陛下在未来仍表现出您的关怀和美意。”

1897 年 国际奥委会的一些委员，首先是维凯拉斯，对希腊想成为复兴的奥运会的永久举办地的愿望十分不安。为了使他们感到自我的存在，也为了给他们表现自我活动的机会，皮埃尔·顾拜旦于 **7 月底到 8 月初** 在勒阿弗尔组织了“卫生及教育代表大会”。皮埃尔·顾拜旦对勒阿弗尔的感情，大家都已知道。这座城市也是时任共和国总统的费利克斯·富尔的故乡，他此前几年曾任法国体操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在迪东神父和英国人库西-拉芬大人的帮助下，这次代表大会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迪东神父和库西-拉芬大人是两位重要人物，前者的名言“*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在 1896 年 4 月刊载在《世界主义期刊》上的顾拜旦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加以引用，后者在后来的 1908 年伦敦奥运会的组织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00 年 顾拜旦被迫同意以附属于 1900 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名目古怪的“国际身体活动和体育竞赛”替代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名称后来再未提及。

1900 年 5 月 22 日，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召开会议。委员们受到埃米尔·鲁拜总统的接见。会议通过芝加哥为 1904 年奥运会举办地。美国人威廉·斯朗拒绝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为确保众所期望的团结和一致性，顾拜旦同意留任，任期定为 10 年，从 1897 年算起。

1904 年 第三届奥运会在美国圣路易斯与“世界博览会”同时举行。奥运会移地举行的决定是 1903 年 2 月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做出的。顾拜

且没有参加这次奥运会，因为国际奥委会此时正在伦敦召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罗马为 1908 年奥运会举办地。

1905 年 **6 月 9 日至 14 日**，有 25 个国家的 205 位代表参加的布鲁塞尔国际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代表大会召开。“奥林匹克奖状”（安德烈·斯隆设计）首次颁发，授予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弗里迪托夫·南森、阿尔贝·桑托斯-迪蒙和 W-H 格伦费尔。英国人格伦费尔因横渡尼亚加拉大瀑布而蜚声体育界。国际奥委会召开会议：同德国的分歧消弭，同意 1906 年举行雅典届间奥运会。

1906 年 4 月，国际奥委会在雅典召开会议。由于罗马打了退堂鼓，会议决定将 1908 年奥运会转移至伦敦举行。首座“奥林匹克杯”奖给法国旅行俱乐部。23 日，顾拜旦在《比利时独立报》发表文章《奥林匹克的复兴》，明确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独立性，[……]这出自它的常设性，它遴选委员的方法，以及它设定自己角色的方式。国际奥委会不是由代表组成，而是由使者组成。[……]委员会自行遴选委员，务求委员的能力、社会地位和判断的自由性足以使他们不受小集团的左右。他们通过选举产生，是奥林匹克主义在他们各自国家的使者。”文章还指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先需要创立，现在则是需要加以净化的时候了。过多与体育无关的活动，过多的野心正在卷入。[……]人们正在使它的机构变得复杂，使它的举行变得昂贵。”

5月，顾拜旦组织的艺术、文学和体育研讨会在巴黎举行。

1907年 5月23日，国际奥委会会议在海牙举行，主要研究下一届伦敦奥运会的比赛计划，并做出采用米制的决定。顾拜旦当选新十年任期的国际奥委会主席。

1908年 伦敦奥运会举行。这届奥运会虽然仍以法英的贸易博览会为后盾，却是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脱离了世界博览会的框架。运动会聚集了22个国家的2035名运动员。在7月24日英国政府举行的晚宴上，顾拜旦发表了题为《奥林匹克理念的受托人》的讲话，评述了五天前美国埃塞尔伯特·塔尔博特主教主持的一场布道[参阅：基本情况]，并明确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作用不是颁布规则[……]。我们不过是奥林匹克理念的‘受托人’[……]。在我们看来，奥林匹克是一个强烈展示体格文化的概念。体格文化一方面建立在勇武的骑士精神之上——诸位习惯于亲切地称之为‘fair play（公平竞争）’原则，另一方面则建立于美学原则之上，崇尚美、崇尚优雅。”

1909年 国际奥委会会议在柏林召开，通过斯德哥尔摩为1912年奥运会举办地。德国非正式地推迟其举办此届奥运会的申请而改为申办1916年奥运会。

1910年 国际奥委会会议在卢森堡召开。

1911年 国际奥委会会议在布达佩斯召开。

1912年 斯德哥尔摩标志着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彻底肯定——这次奥运会摆脱了一切博览会，由 28 个国家的 2547 名运动员参加。顾拜旦用化名获得一枚金牌[参阅：唯美主义者]。

1913年 5月：6日和7日，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召开会议。8日到10日，举行了“运动心理学代表大会”，顾拜旦作为新方向的开拓者做出巨大贡献。

在8月号《奥林匹克评论》上，他展示了1914年使用的会徽和会旗，并以很少被人引用的三言两语概括了奥林匹克主义的巨大意义：“奥林匹克主义重现现代文明，不是为了扮演一个地区性或过渡性的角色。它被赋予的使命是世界性的和世纪性的。它胸怀远大，需要整个的空间和全部的时间。”

1914年 奥林匹克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这次大会因举行“奥运会恢复2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因国际奥委会首次与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聚会而倍受瞩目。会议记录后于1919年才发表。有共和国总统雷蒙·布安卡尔亲临出席的大会开幕式6月17日在索邦大学隆重举行。顾拜旦第一次向公众展示了由他亲自设计、由邦马歇商场制作的奥林匹克旗帜：“白色的旗帜中央有蓝、黄、黑、绿、红五个颜色的圆环，环环相套，象征五大洲通过奥林匹克主义团结在一起，并表现了各国国旗的颜色。”（《奥林匹克回忆录》，第144页）

1915年 4月10日，国际奥委会常设总部正式迁至洛桑，简短的签字仪式

在 11 时和 11 时 30 分之间于市政会议大厅举行。

1916 年 在 1914 年奥运会恢复 20 周年庆典之后，顾拜旦即已萌生辞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想法。但是在那个冲突爆发的危机时刻，他认为他这个“船长”是不能离船而去的。他在加入法国军队后，特请国际奥委会的瑞士委员戈德夫洛夫·德·布洛内从次年 1 月 1 日起代行他的主席职务。

1917 年 顾拜旦第二个 10 年主席任期届满，他的职权由德·布洛内代为行使。

顾拜旦创立“奥林匹克学院”。出版为南美洲广大读者撰写的宣传小册子《什么是奥林匹克主义》（30 页）和 1918 年的《奥林匹克年鉴》。

1918 年 顾拜旦开始在《洛桑报》连续发表《奥林匹克书信》。在 10 月 26 日的文章中，他写道：“奥林匹克主义反对把体育教育当成纯生理学的教育，反对将不同的锻炼方式视为独立的、自成一项的单项运动；[……] 奥林匹克主义致力于铲除隔阂的高墙，奥林匹克主义支持芸芸众生都能享受到空气阳光。[……]这就是体育教育的纲领。这一纲领会转变为现实吗？” 11 月 22 日，他再次阐明他的思想：“奥林匹克主义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它可以吸纳各种思维模式，使其彼此交融，没有任何种族任何时代可以将之垄断独霸。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它

源自于双重崇拜：崇拜自身的进取，崇拜和谐的发展。
请看，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是多么地贴近人类的本性啊
——既追求超越，也讲求节制。”

1919年的《奥林匹克年鉴》出版。

1919年 《奥林匹克书信》19篇连续发表。庆祝奥运会恢复25周年的活动在洛桑举行。

1920年的《奥林匹克年鉴》出版。

1920年 安特卫普奥运会举行。首次进行的奥运会宣誓由比利时击剑运动员维克多·布安完成。

1921年 5月26日到6月7日，“奥林匹克代表大会暨协商会议”在洛桑联合举行。在26日和27日举行的“冬季体育运动协商会议”上，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持强烈保留态度，还是通过了1924年在夏蒙尼举行“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的提议。事实上这次冬季运动会后来成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点。29日和30日，召开了抱负非常远大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代表大会”，这可以说是这些组织向国际奥委会靠拢的某种征兆。6月2日至7日，举行了由瑞典人埃德斯特隆主持的国际奥委会会议。第一天晚上的会议上，分两阶段投票表决通过了顾拜旦早在5月17日表达的愿望：委托巴黎举办恰逢奥运会恢复30周年的1924年奥运会，同时委托阿姆斯特丹举办1828年奥运会。

1922年 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召开会议。顾拜旦明确表示于1924年奥运会后

退出主席职位的意愿。未来继任者的任期由 10 年减为 8 年，即两届奥运会的期限，从 1925 年开始计算。

1923 年

国际奥委会会议在罗马举行。顾拜旦在开幕词中强调：“[……] 奥林匹克主义，就像我们所构想的和所努力落实的那样，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个培养我们意志的苗圃。[……] 我们进步得很快，我甚至可以说是过快了，我们必须有双重的保障支持这些进步。当今，这确保一种组织的力量量的双重保障，就是民主主义和世界主义。”

洛杉矶被选为 1932 年第 10 届奥运会的举办地。

1924 年

2 月，顾拜旦出席夏蒙尼首届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6 月 23 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30 周年庆典在索邦大学举行，加斯东·杜梅尔总统出席。第 8 届夏季奥运会在巴黎举行，44 个国家的 3092 名运动员参加。顾拜旦提出了奥运会的正式报告，他采用的题目不是通常使用的格言“*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健康的精神在健康的身体中）”，而是“*Mens fervid in corpore lecertoso*（奋发的精神在健康的身体中）”。他在报告中说：“奥运会将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子，仅此而已：一个四年一度的春天的节日，那是一个有序的、跳跃的、让精神充满青春活力的春天。”

1925 年

5 月 26 日，国际奥委会会议在布拉格召开。28 日，在选举主席的头轮投票中，虽然顾拜旦已明确表示去职的意愿，还是有一定数量的选票投给他，结果未能形成绝对多数票。经第二轮投票，比利时人亨利·巴耶-拉图尔当选，成为继维凯拉斯和顾拜旦之后的

第三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5月29日，在布拉格市政府大厦召开了奥林匹克双会——技术代表大会和教育代表大会。顾拜旦的开幕词成为他离开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并和同事们的告别词。他说：“圣殿长存，集市易散。是选择集市还是圣殿，运动员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他们不能要求兼而有之：……让他们做出选择吧！”此次会上，皮埃尔·德·顾拜旦被授予国际奥委会“终生荣誉主席”称号，此称号除他以外不再授予任何人。后在洛桑举行了主席权力交接仪式，继任者于9月1日起正式履行职责。

1927年

顾拜旦应邀前往希腊，重游奥林匹亚，这将是她唯一的一次旧地重游。他第一次游历奥林匹亚时，曾百感交集。“33年前，在一种非常适宜沉思冥想的孤独中，我完成了这次朝圣。[……]那是1894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在回法国途经意大利的时候，从雅典来到这里，内心意识到自己已取得成果，但是同时也意识到未来将会荆棘载路，命途多舛。我记起那条蜿蜒伸向山丘的小路，博物馆和旅馆就座落在山丘上。阿尔费河上清风徐起，送来阵阵幽香。一时间，月光通明，朦胧的景色变得格外清澈。星夜垂落在我已试图与之亲近的两千年的光阴上。第二天早晨，我伫立窗前，等待日出。当第一抹阳光穿过山谷时，我[……]奔向那片废墟。[……]”

这是一座我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道德的建筑。这样的一座建筑，是雄伟，是壮丽，是辉煌。整个上午，我沉浸在深思中[……]。在这1927年4月16日的晚上，那时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又重复了我曾做过的一切：伫守窗前，注视游移的月光掠过阿尔费河牧场；第二天清晨，徜徉废墟之中，追寻昔日的辉煌。”（《奥林匹克回忆录》，第205页及后页）

4月17日，他在奥林匹亚参加了纪念奥运会恢复的大理石志碑的落成典礼。他的名字镌刻在志碑上，这是希腊政府对他所致的迟到的敬意。他借典礼机会发出了《向各国体育青年的呼吁》：

“我和我的同事们努力奋斗，还给了你们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是为了使之成为博物馆的展品或电影创作的题材，也不是为了让金钱的利益或选举的考虑将其催垮。[……]在这充满巨大的可能性也同时充满堕落的威胁的现代世界上，奥林匹克主义可以成为一所既培养高尚精神和美好情操也锻炼身体耐力和力量的学校，而条件是，你们必须不断地将你们的体育荣誉的观念和非功利的观念提到与你们身体力量相称的高度。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

1928年

发出《致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各位运动员和参与者的一封信》。顾拜旦没有出席这届奥运会。他在信中说：“我在

这里[……]同你们道别。我希望你们将复兴的奥林匹克主义的火炬保留在你们中间，并高高擎起。我希望你们坚持奥林匹克主义所必不可少的那些原则和组织体制。”他在信中还回顾了奥林匹克主义的组成部分和相关的仪式。

1929 年 在巴黎 16 区政府大礼堂举行了题为《奥林匹亚》的重要报告会。

1931 年 出版《奥林匹克回忆录》(218 页)。“我希望复兴的，不是
至 这种有上千年历史的活动组织形式，而是其本原。[……]
1932 年 我要努力复原那些过去曾支撑过这个教育方向的坚强支柱：知识、道德和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的宗教。现代世界又添加了两种新的力量：技术的完善和民主的国际主义。”(第 77-78 页)

1934 年 奥林匹克主义 40 周年庆祝活动在洛桑举行。“40 年前的这个时候，在索邦大学庄严宣告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它的命运符合我的努力和愿望。我明确指出这一点，不是出于骄傲，而只是为了重申曾被无知或别有用心所歪曲了的事实。”

1935 年 柏林广播电台播出瑞士法语地区电台录制的顾拜旦所做主题为《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广播谈话，其中概括了他的指导思想的要旨。“我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立者和

荣誉主席，受邀为这个评论奥运会意义的广播谈话节目的开播发表谈话，这对我是莫大的荣幸。我认为最好的回应莫过于在此阐述我一直努力使我的事业立足其上的原始思想和哲学基础。[……]

无论古代的奥林匹克主义还是现代的奥林匹克主义，其首要的特征都是如此：这是一种信仰[……]。构成现代奥运会的所有的文化形式皆由此而引出。[……]

第二个特征[……]，这是一种贵族化的、精英化的行为，当然，这是不论出身而一律平等的贵族，是凭意志而练成某种程度的肌体能力所划定的贵族。[……]

但仅仅是精英还不够，还应该是骑士。[……]

休战的理念，同样是奥林匹克主义的一个要素，这是与节奏的理念相联系的。[……]

最后一个要素，是参与艺术竞赛和思想竞赛所表现出的美。是啊，人们能够举行人类春天的庆典而不邀请精神参加吗？”

1936年 首次将奥林匹亚点燃的火炬接力传递到奥运会举办地。顾拜旦当此之时发表了《致奥林匹亚——柏林的火炬传递手》的信。

“运动员们，你们将用你们热情的双手高擎这象征的火炬，把它从奥林匹亚传递到柏林。[……]请你们代我向欢聚一堂的青年们提出我的请求，请他们继承我的努力的遗产，完成我已开始的、但因充斥周围的陈规陋习而未竟的事业——为进步，为人类尊严，将肌体与思想牢不可破地、永远地结合在一起。”

直到最后，他对他所开创的这一事业一直抱着满腔热情。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业的成功本身遮掩了他的其他事业的成就。在1936年的一篇手写和打字原稿（其所有权归纳瓦塞尔家族）中，他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他本打算将这篇文字作为他的回忆录的第五部分《未完成的交响曲》的开头。“我记得，在1935年11月1日慕尼黑科学技术馆的报告会上，我曾明确解释过[……]奥林匹克主义只是我的事业的一部分，差不多是一半的事业。可以说，我的教育‘交响曲’是由一个已完成的部分和一个未完成的部分组成。”

无论以后会有何种曲折，迄今为止的奥运会的现代历史已经印证了这位高瞻远瞩的人的真知灼见。他在1931年曾写道（《奥林匹克回忆录》，第214页）：“奥林匹克主义的基础坚如磐石，它前程似锦。正因为如此，奥林匹克主义的火炬在一处熄灭，又在另一处燃起；现在的潮流足以使火炬的光焰传遍全球。”

记者、撰稿人和报人

“巴黎记者协会”颁发给“皮埃尔·德·顾拜旦先生”的印有 1895 年字样的记者证当然不是赝品。据统计，从他 1886 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算起，到他 1937 年 7 月 7 日发表的最后一篇为止，他共计在国内外的 70 多种报刊上刊载文章约 1300 篇！如果说其中很多文章收入了他的书中，可以相对容易地读到，非常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则已散佚。

他写报告、长篇文章、短评等各类文字，有时也不乏幽默，比如他就曾写道：“大约在十年前，当我作为现职的领航员而非荣耀的天父在搞奥林匹克主义的时候……”他无止境的精神活动和写作活动充实着他的整个一生。

以下这份他曾为其撰过稿的 57 种报刊的名录更能说明问题。名录按他发表文章的时间为序：《通讯》(Le Correspondant, 1887 年)、《雅典古建筑杂志》(La revue Prytanéenne, 1889)、《大型期刊》(La Grande Revue, 1891 年)、《大学评论》(Revue Universitaire, 1892 年)、《政治与文学评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1893 年)、《巴黎评论》(La Revue de Paris, 1894 年)、《雅典信报》(Le Messenger d'Athènes, 1894 年)、《新杂志》(La Nouvelle Revue, 1896 年)、《杂志期刊》(The Review of Reviews, 1896 年)、《世界》(Cosmopolis, 1896 年)、《时代》(The Times, 纽约, 1897)、《时代》(Le Temps, 1896 年)、《国家画报月刊》(The Country illustrated monthly magazine, 1896 年)、《体育运动》(Tous les Sports, 1897 年)、《半月刊》(The Fortnightly Review, 1897 年)、《德国人杂志》(Deutsche Revue, 1898 年)、《蓝色杂志》(La Revue Bleue, 1898 年)、《建筑月刊》(Monthly Building, 1898 年)、《两个世界期刊》(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99 年)、《北美洲评论》(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0 年)、《法国旅游俱乐部》(Touring Club de France, 1901 年)、《高卢人》(Le Gaulois, 1904 年)、《时代》(Die Zeit, 维也纳, 1905 年)、《新闻》(La Presse, 1908 年)、《罗马体育》(Gli Sports Roma, 1909 年)、《国家教育月刊》(Revue mensuelle d'Education Nationale, 1912 年)、《体操运动员》(Le Gymnaste, 1912 年)、《周刊》(La Revue Hebdomadaire, 1914 年)、《小纪龙德报》(La Petite Gironde, 1914 年)、《瑞士评论》(Revue suisse, 1915 年)、《美国体育教育杂志》(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 1915 年)、《评论期刊》

(La Revue,1917年)、《日内瓦论坛》(Tribune de Genève,1918年)、《洛桑通报》(Feuille d'avis de Lausanne,1920年)、《运动杂志》(Revue des Sports,布鲁塞尔,1920年)、《体育画刊》(La Revue sportive illustrée,1920年)、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1921年)、《一周刊》(La Revue de la Semaine,1922年)、《世界杂志》(La Revue Mondiale,1922年)、《瑞士体操运动员》(Le Gymnaste suisse,1922年)、《人民权利》(Le Droit du Peuple,1923年)、《瑞士》(La Suisse,1923年)、《日内瓦评论》(La Revue de Genève,1924年)、《火》(Le feu,1926年)、《体育画刊》(La Revue Sportive Illustrée,1928年)、《实践》(Praxis,1928年)、《瑞士体育》(Le Sport suisse,1928年)、《布拉格新闻》(Prager Presse,1928年)、《电讯》(De Telegraaf,1928年)、《职业体育》(Pro Sport,1928年)、《苏黎世新闻期刊》(Neue Züricher Zeitung,1931年)、《自由新闻》(Neue Freie Presse,维也纳,1935年)、《BZ 午报体育版》(BZ am Mittag,1936年)、《欧洲评论》(Europäische Revue,1936年)、《瑞士大学学报》(Schweizer Hochschulzeitung,1936年)、《马德里街走读学校校友会公告》(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l'Externat de la rue de Madrid,1937年)。

除《法国人》之外，皮埃尔·德·顾拜旦还是下面大事年表中提到的12种报刊的合作者或常任主编。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记者、撰稿人和报人生涯的连续性。

1886年 **11月1日**，顾拜旦为《社会改革》撰文《英国的中学，哈罗公学》，从此踏上公共社会舞台。此文及同栏目刊出的其他一些文章后来收入《英国的教育——中学与大学》一书中。他同这一杂志专栏合作到**1889年**。

1887年 **8月30日**，在《法国人》上发表《高度疲倦》一文。文中提到成立一个组织，此即后来的“身体锻炼教育宣传委员会”。

1890年 1月25日,《体育运动月刊》创刊号面世。顾拜旦任经理和主编。在题为《吹牛》的社论中,他用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语自我打趣地说:“那么我呢?是不是也需要我给您一张我的写真照呢?我的一些朋友声称,我有点儿‘神经错乱’。他们可能说得没错。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自己将和我的‘错乱的’神经一起竭尽全力使您感到满意,并由此而使《体育运动月刊》获得成功。”他全篇主编这份64页的期刊至1891年11月,随后与《体育运动》杂志进行合作,直到1894年10月27日。

1894年至1914年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大业开始之际,顾拜旦便深切地感到拥有一份机关报的必要性。由此有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公报》。此刊物为几页纸的大开版本,其中3期是在1894年7月到1895年1月之间刊行的。1894年7月发刊的首期的刊头标有地址:巴黎圣奥诺尔街229号,并且题有按“更快、更强、更高”顺序排列的拉丁语格言。标有“1896年4月6日-18日”的《雅典信使》第15期名下增刊也推出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公报》。1901年1月,《奥林匹克评论》发刊,不定期出版,直到1905年底;自1906年改为定期出版的月刊。顾拜旦从未间断地一直领导和主编着这份刊物,直至战争时期为止,确切地说,直至1914年7月的103期为止。

1899年至1903年 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发表第一批系列文章《欧洲的未来》(1899年,11月)[参阅:历史学家]。之后,从1900年1月14

日到10月29日，连续发表《独立者书简》42篇，对法国、欧洲和世界的政治进行了分析。1903年2月2日至10月20日，续写《独立者书简》（编号第44篇到第58篇）。

1902年
至
1906年

1902年7月14日以《进退两难》一文开始与《费加罗报》合作，撰写约为两月一期的专栏文章，直至1906年8月13日。

1902年
至
1912年

1902年3月，《科地区评论》发刊，顾拜旦一身兼任设计、编辑、发行等数职，同时还是赞助人。刊物免费发放，1903年停刊。1906年1月，按同一原则创立的《法国人》杂志刊行，一直出版到1912年12月为止。

1906年
至
1908年

从1906年12月31日到1908年10月15日，《身体教育运动》杂志连续载文《身体教育》，这些文章构成了1909年“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一载体育奋斗》一书的前19章（共22章）。

“也许我应该将此书献给那些以其激烈的攻击促使我写出这本书的人们。多亏了他们，我得到快乐和裨益。[……]当有些改头换面或鲜为人知的真相需要澄清的时候，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日期和线索，我回忆起许多我本会忽略的事实。”

1914年
至
1916年

1914年10月26日，正当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以一文《告全人类书》开始了与《EXCELSIOR》（《卓越》）日报的合作。在1915年7月19日刊出文章《我们的法兰西》之后，合作便

以撰写《EXCELSIOR》（《卓越》）《体育课堂》专栏文章的形式开始进行。自 1915 年 7 月 12 日到 1916 年 1 月 3 日，撰文 25 篇或 26 篇。

1918 年
至
1919 年

自 1918 年 10 月 14 日开始在《洛桑报》刊载《奥林匹克书信》，到 1919 年 5 月 17 日，共发表 21 篇；如大家所知，这些书简常常以最明确的方式记述了顾拜旦的心路历程 [参阅：体育人和奥林匹克人]。

1924 年

在洛桑法国联盟所做的讲座《新闻界的责任和改革》单行本出版。“[……]我从未脱离过新闻界，我一直是我们法国一个重要的记者协会的忠实会员。然而，这个舆论已经习惯将我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事业，却并不是通过新闻界，甚而无视新闻界，而名声鹊起。其中原因十分复杂[……]。我承认，我几乎没有为复兴的奥林匹克主义寻求过新闻界的宣传：我对其抱有的戒心远远大于我希望从中获得的好处。”（第 5 页）

1931 年
至
1932 年

从 1931 年 12 月 8 日到 1932 年 3 月 27 日，《奥林匹克回忆录》的“25”个篇章在体育日报《汽车》上“预载”。这部回忆录 1932 年由国际体育教育局出版，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保尔·胡布印刷厂承印。有意思的是，此版本的“版权”生效期标为 1931 年，最后一章《传说》只排到第 23 章。

可以看到，直到最后，报刊和新闻界对他来说都是何等重要，尽

管他总是日益警惕地抱有这样的戒心：“使艺术、文学、科学深受其害的现代癌症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界制造的，新闻界是这些病毒的培养液[……]，本身就是制造耸人听闻事件的病毒”。他不是一直将新闻界的“使命”视为“最高使命之一”吗？他不是希望“这一使命成为它理应成为的使命——一种接近家庭教师的职责，一种堪称神圣的职务”吗？（1924年的讲座，第5页和15页）

作家

顾拜旦作为评论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行文条理清楚，文笔优雅而颇具古风；引喻用典令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但也有时略嫌费解。他兴之所来，偶尔也模仿一下拉布吕耶尔的风格，比如《假运动员》：“自从体育运动变得时髦起来，卡里玛蒂亚也不甘人后，认为自己万万不可袖手旁观。于是他风风火火地置备了各种各样的运动服，满口讲起运动术语。[……]”

（《奥林匹克评论》，1910年5月号）他以同样嘻笑的态度为他1925年5月在艾克斯-昂-普罗旺斯游艺场所做的讲座起名为《时间记录保持者亚历山大大帝》。他曾问津纯文学，这一点鲜为人知。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在经常性的工作中忙里偷闲，消遣一下呢，还是因为他无法克制文学创作的冲动呢？不管怎样，事实是，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体裁的混淆和误会的发生，他在单笔名或双笔名的掩护下进行了值得注意的文学创作。

1899年 从2月15日到4月1日，《新杂志》分5期刊载了署名乔治·霍罗德的一部文学作品《归顺记》。这部作品当然不宜与莫伯桑和左拉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却也不失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惊世之作。

这本书有许多地方表现为自传体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使人很受启发的读物。主人公埃蒂安·德·克吕塞纳去了美国，后来回到位于黑山支脉上的克拉尔费罗的布列塔尼城堡——这显然是在投射诺曼底米尔维尔城堡，不久移居巴黎，住在位于格勒内尔街和瓦莱纳街之间的家族老宅，在经历了一段巴黎生活之后，最终完全归顺了共和国。他收到卡诺总统的接见——就像现实中的顾拜旦那样。总统在接见临近结束时说：“我知道你深深地爱着法国，这是不会背叛的爱。”他再次去了“红色的大地[……]。那些与科尔特人毫不沾边的人[……]认为，只有人才会讲话。但是科尔特人知道，大自然的一切都会讲话和歌唱。”在《归顺记》中，也即皮埃尔·德·顾拜旦在汇集连载的单行本（1902年拉尼埃出版社于奥吉塞尔出版）的最后一段文字中，表达了生命竞争为他所揭示的深刻含义 [参阅下文：诸多语录中的三段]。

1912年

顾拜旦是散文大家，他也有诗作。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奥林匹克文学比赛组织委员会曾收到署名乔治·霍罗德和M·艾斯巴赫的一篇双语作品《体育颂》，诗句是法语和德语相对照的，这在当时实属大胆。真实作者顾拜旦的姓名似乎一直没有公开。评委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金牌授予了这篇七节颂歌的作者，顾拜旦由此高兴地成为他本人所创立的奥运会的比赛的真正获奖者。

“啊，体育，天神的恩赐，生命的动力，你赫然降临，[……]
曦微晨光，洒向山峦之颠；灿烂阳光，照耀昏暗大地。”

唯美主义者

在顾拜旦编制的革新教育的纲领中，设有美学。“如果必须给艺术下个定义的话，仅就其在教育中的作用而言，我就要说，这首先是一种审美意识。唤醒青年人心灵中的审美意识，就是在努力使个人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完善[……]。为这种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加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加以制度化，难道不是可行的吗？”（《公共教育札记》，1901年，第307页）

在他的惊世之作《世界史》（1926年-1927年）的书末索引中，除字母索引外，还有六大类主题索引，其中一大主题即为“艺术、文化、文学”。足见精神活动在这部洋洋大观的世界和文明的史书中所占有的比重。通过这部著作，亦可看到顾拜旦涉猎艺术文化的广度。这些文化有英国的、阿拉伯的、亚速的、拜占庭的、中国的、埃及的、西班牙的、弗朗特勒的、法国的、希腊的、印度的、印度希腊的、意大利和威尼斯的、日本的、波斯的、腓尼基的、罗马的等等。

顾拜旦人格和思想的深度和内涵远远超出了他在富裕家庭环境中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我们知道，他的父亲夏尔·弗莱迪·德·顾拜旦本人即是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正式”画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留下的钢笔画——其中几幅是前几期《科地杂志》的封面，还有他的旅行速写，都表现出他的绘画天赋。年轻时的皮埃尔也常常在乌迪诺街的“晚会”上坐到钢琴前弹上几曲为大家助兴。审美和艺术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1897年 首届奥运会后的一年，《美洲和希腊的回忆》出版（1897年）。书中顾拜旦谈到了音乐：“两千年以来时尚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但是音乐却始终是最能表现人群情绪的手段，是最能烘托大场面的恢宏的手段。”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在

1894年那次决定性的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正是出现在响起《阿波罗颂》的时刻吗？这首颂歌是法国学校在特尔斐古城的最新发掘中发现的，由泰奥多尔·莱纳克和加布里埃尔·富雷用现代音乐语言改编而成。“那古老的旋律仿佛穿越悠远的年代，回荡四周，一种怀古之幽情弥散开来。”

（《奥林匹克回忆录》，第18页）

1906年

5月23日，“艺术、文学和体育研讨会”在法兰西剧院之家召开。他对此企盼已久，因为他深知，“在奥林匹亚辉煌的时代[……]，文学和艺术与体育和谐地融为一体，确保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壮丽”。（《费加罗报》，1904年，后收入《二十一载体育奋斗》）他为此会做了精心准备。对他而言，这次会议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新阶段的到来。大会有两个宗旨：“一方面，组织声势浩大的艺术和文学与复兴的奥运会活动的合作”，另一方面，“促进日常性的、简单的和小范围的艺术和文学与体育活动的合作”。在索邦大学大阶梯教室举行的这次会议以一个精彩的“体育艺术节”结束。这个体育艺术节是按顾拜旦的初衷明确写入奥运会赛程中的艺术比赛和文学比赛的起点。艺术比赛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诸项。艺术和文学的比赛从斯德哥尔摩奥运会（1912年）开始，到伦敦奥运会（1948年）结束。对优胜者颁发的奖牌与体育比赛的奖牌相同。虽然历届组织委员会在奥运会后的“正式报告”中对这类比赛都做了赞扬性的总结，但是事实上，人们并未普遍接受这类比赛。这固然是因为物质条件造成了很多困难，而最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流的大艺术家和文学家原则上都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命题比赛，拒绝受人评判。说来也是，用什么标准评判呢？顾拜旦自己

也注意到这点，他在《给参赛者的建议》（《奥林匹克评论》，1911年）中说：“对于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管理体育那样进行管理。”

1910年

推出国际现代奥林匹亚建筑设计比赛。他在以《现代奥林匹亚》为题的参赛说明书中提到，“古奥林匹亚是一个体育、艺术和祭祀之城”。1911年5月，比赛获奖的两位建筑师沃德瓦·欧仁·莫诺和阿尔方斯·拉韦利埃尔出席了在索邦大学校园举行的晚会。其间，体操、摔跤、击剑、舞蹈等节目的表演竞放异彩，帕莱斯特里纳和拉莫谱写的合唱悠扬回荡，而光和影的奇妙配合更给观众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1894年的代表大会举行期间，就曾以同样的审美情趣在卡特兰十字（赛跑俱乐部）组织过500人的晚会。后来在**1914年6月18日**，为庆祝奥运会恢复20周年，也是本着同样的精神在特洛卡代罗宫举行了“体育和艺术节”。同样，**1914年6月24日**，为庆祝国际奥林匹克代表大会的召开，兰斯体育中学组织了盛大节日。

**1911年
至
1912年**

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临近，艺术和文学的比赛将纳入此届运动会赛程。顾拜旦加紧了这方面的努力，在《奥林匹克评论》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1912年收入大众体育协会名下出版的题为《装饰、花炮、和谐、队列》一书中。这本“供体操和体育协会使用的腊斯克主义的读物”，显然受到英国人约翰·罗斯金著作的影响。后来还有两部著作收入他的私人藏书之中：罗歇·拜尔的《世界美术史年表》和埃里·富尔从1921年开始出版直到1927年才出齐的巨著，5册的《艺术史》。

1913年 5月8日，“运动心理学大会”开幕，顾拜旦在洛桑拉克修院平台上组织了一个庆祝晚会，大获成功。

1916年 在《更好地了解法国》丛书中，两本写《法国艺术的伟大时代》的小册子引人注目。第一册名为《从起源到16世纪末》，第二册是《从17世纪到当代》。

1919年 顾拜旦认识到体育可以给艺术提供“运动的韵律”（1914年6月20日《一周评论》）。他的《体育教育》的最后一章专门谈到“体育与艺术”。他在此章中明确指出：“体育应该视为艺术的生产者，艺术的表现场合。体育产生美，因为它造就运动员，而运动员即是活的雕塑。体育是美的表现场合，因为它活动的场地，它精彩的表演，它节日的气氛，无比体现出美。”

体育的这个方面，顾拜旦十分看重，提出了他的体育“罗斯金主义”的建议，但是却一直极少引起人们的重视。

1935年 当全面教育联盟采用“十支光焰的火炬”的象征图像时，它就是在告诫自己不要忘记“审美的观念，这种难以言传的、人的本能所趋向的美的观念”。在《现代奥林匹克主义哲学基础》的广播谈话中[参阅：奥林匹克人]，顾拜旦也一如既往地强调“艺术和思想参与奥运会的美”。

他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和谐”的观念。和谐就

是将不同的快乐同时调和在一起的协和的平衡。正是和谐这种分寸和协调的观念，与古希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一种完美的或不那么完美的、但肯定是无可争辩的和谐存在于自然景色与建筑之间，存在于建筑与人之间。真正的奥妙就在这里。 [……]现在这种最完美的一致性已在这三种元素之间无所不在。”（《回归希腊城邦》，1907年2月《奥林匹克评论》，后收入1913年《运动心理学论文集》）正是这个观念激发他在如此艰难的1915年，在《卓越》报上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是的，这个制造和谐的巨大的工厂，过去曾在希腊蔚蓝的天空下运行，现在也完全可以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毫无疑问，这样的一天必将到来。可能我将看不到这一天，但是我至少可以感到欣慰：我为这一天的到来奋斗了30个年头。”

在他的巨著《世界史》（《卡佩家族》，第3章，第92页）中，对大教堂有所描述。对于这些描述所具有的文化性和艺术敏感性，人们怎么可能不是洞若观火呢？人们怎么可能忽视他的思想和事业的构建所具有的文化性和艺术敏感性呢？这段描述是这样的：“尖顶的大教堂，既已找到增加高度和减少重量的方法，便有如得到神助，拔地而起。这些教堂变得越来越轻盈而剔透，五彩斑斓的玻璃窗闪烁着奇妙的亮光。 [……]在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建筑中，布局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轮廓的独立性和和谐性，光影的对比度和融和度，都不

曾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既感到心平气和，又感到热情似火。”

人道主义者

皮埃尔·德·顾拜旦密切关注科学的趋向和发现，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风格首先还是“文人”的。他的追求，他的趣味，还有他的工作，都表现出一种开放的精神。事实上，他与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是一脉相承的。以他学识的博大精深和著作的丰富多彩，他堪称百科全书派大家的最新传人。正是出于此，1919年10月8日奥林匹克学院第4期开学的第一课即是：“天文学的阶段。世界的力学和化学单位，星辰的生命”。他具有普及者的天赋。普及者这一褒义词，是指善于让人分享知识的人。

顾拜旦富有同情心，理解他人，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者。

他是人道主义者，还是因为他渴望人类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是和平关系的保障；奥林匹克主义直接产生于这一前景之上。

他是人道主义者，也是因为他具有向所有人开放的体育的理念，具有为了向所有人打开知识大门而进行战斗的意向。“从一开始就要创造光明，这是现代民主的当务之急，因为成年人的大部分的社会仇恨都是从青少年时代所形成的不协调的知识结构中产生并保持下去的。”（《世界的分析》，1912年，序言，第36页）

1892年 奥林匹克主义的诞生建筑在对和平的展望上。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他在呼吁大家帮助他完成“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之前 [参阅：奥林匹克人]，这样开场道：“让我们输出桨手、赛跑

选手、击剑手吧！这将是未来的自由交换，当这样的交换深入到古老欧洲的习俗之中的那一天，和平的事业便会得到新的、强有力的支援。”（《二十一载体育奋斗》，第90页）

1894年

在11月16日帕纳斯协会的会议上，顾拜旦极力争取雅典人同自己站在一起，他明确而坚决地说：“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应该每4年为世界青年提供一次快乐而友好的欢聚一堂的机会。这时，存在于人民之间的误解，那种延续仇恨、积聚误会、加速事件朝着残酷而野蛮的争斗方向恶化的误解，将会逐渐消弭。”（《文选》，第2册，370页）

1896年

与形形色色的与形形色色的诊断和预言相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计划终告实现，雅典奥运会取得成功。顾拜旦在他撰写的正式报告中自豪地强调了他所确定的路线：“一般情况下，很难知道一种想法何以及如何从众多的想法中脱颖而出，何以及如何产生出来并成为现实。但是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恢复举行奥运会的想法不是心血来潮，突发奇想，而是一个伟大的运动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这里，我要大声宣告我与奥运会的亲缘关系，我要再次感谢那些帮助我完成这一事业的人们，那些和我一起抱有这种信念的人们：体育事业将变得更加壮丽、更加崇高，国际青年将从中汲取对和

平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公元前 776 年-189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第 58 页)

世界大战爆发时，顾拜旦要求加入军队。他在尽“爱国者”的责任。他过去就曾对“全国宣传协会”和《全国教育月刊》明确指出过，“准备报效祖国的青年们应该这样解读共和国的花体字母标识[RF]的含义，那就是：思索、强壮、迅速、坦率、忠诚和自豪。”但是他并未因此而陷入狭隘的好战主义。例如，他在 1915 年向“法国青年”提出的《十诫》中，就曾指出：“不要对任何异族人民和任何异族文明抱有仇恨和实施暴力。仇恨和暴力是懦夫的领地。这里所劝诫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这是以最纯洁、最高尚、最道德的方式为国际斗争进行准备。”又例如，在第 8 则中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保证进一步了解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以便懂得法国所应发挥的作用并找到一种进行良性的国际竞赛的原则。”

在一个纷争不断的世界里，这样一个乌托邦会有些微的机会取得进展吗？“我知道，也了解那些轻蔑和嘲讽。当我想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不是也曾被当作疯子吗？”(《在两场战斗之间》，1922 年)这就是为什么顾拜旦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这场新的战斗中去。在他最初踏上征途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样的战斗，而当世界的冲突结束之时，他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这样的战斗，从未气馁。

1890 年 10 月末和 11 月初，他向二十几位知名人士发出《创办工人大学

教育的呼吁》，这些人士中有：儒尔·西格弗里德、费迪南·比松、拉维斯、利奥泰、饶勒斯、迪东神父、瓦格纳牧师。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有迹象显示[……]‘第四等级’的到来，这个等级即使不即位于诸国政府，至少也将在政治生活中占一席之地。[……]而第四等级对此尚未做好准备。”为了帮助他们进行准备，顾拜旦甚至考虑到是否应该以他1887年在伦敦怀特查普尔贫困街区的所见为榜样，走英国人开辟的道路。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能让他实现这种想法的时机。

1918年

四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他看到许多，想了许多。他撤到后面，这是事实，而且终止了某些关系，随后定居瑞士。这时他观察世界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开阔。他站到世界的高度上，站到政治的高度上，高屋建瓴。他同自己出生的社会环境离得越来越远，对政治的变化了解得至为透彻。“一种将民主推向权力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出现了。民主是多数，多数变成力量。[……]战争爆发了。民主证明它不仅意味着多数的概念，而且意味着无畏无惧、勇于牺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史当然不会指责那些领导和指挥这些战斗的大众的人们，但是更会向这些无名的战斗者的群体表示特别的敬意。[……]民主自身也应该积聚世代的教益并与公平共享的知识挂钩。民主已经准备好从中受益，其准备的充分程度远远超过一些人所想象的程度，这些人因对民主存有戒心而不敢想象。伟大的历史潮流扑面带来的清新空气，对无穷尽的宇宙的揭示，艺术创作的氛围，这一切都正在使民主进程的举步维艰变得步

履轻盈。打开圣殿骑士团寺院的大门吧！是时候了！这是人类未来的要求。”（1918年奥林匹克学院刊印，收入1933年《文选》，第121页-122页）

1919年 同一思想在延展。“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人民大众的赞同，任何决定都是无法做出的。群众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采用‘人民大学’这样的手段，进行有益的尝试，我打算尽快实行。[……]这里不仅有思想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也有身体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面向大众的体育活动’，就是我们想在进步的市政当局和大型的工人协会的帮助之下所要组织的。人们谈到‘无产者的奥林匹克主义’，这种限定的标示并不使我感到畏惧。”（《左右为难》，《日内瓦论坛报》，1919年12月8日）

1922年 1919年的“人民大学”在1921年成为“工人大学”。顾拜旦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从一个战役转向另一个战役。“我的朋友们似乎感到错愕，当我幸运地比他们所普遍预料的都更加彻底地取得了奥林匹克战役的胜利之后，我竟不思就地巩固战果，而是在一个情况不明的战场，用一些兵力不清的部队，在一个社会的风暴即将来临的不安时刻，发起了另一个战役。这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莽撞行事，而是一个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的行动，只不过最近的事件加速了这个行动的进程并凸现了它的必要性罢了。[……]我对工

人阶级充满期待；他们拥有巨大的力量；我相信他们能够成就非常伟大的事业。[……]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产生一个完全由工人掌管的‘工人大学’的计划。”（《在两次战役之间》，《从奥林匹克主义到工人大学》，《一周评论》，1月20日）

1923年

顾拜旦以其一贯的顽强作风，锲而不舍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没有人可以否定，无产阶级曾经一直被全面地隔绝在非功利的文化之外，有产阶级只是迟迟地、无可奈何地给他们打开一道普及程度不同的职业教育的门缝，而这也只限于能够以此提高工人生产率的范围之内。[……]知识像一座连绵不断的高大山脉，我们的父辈黎明即起，手执灯笼，向这座高山进发。从远处可以看到山脉的全貌，但是走得越近，就越是不识庐山真面貌了。人们分成不同的小队，从相互隔离的不同的山谷开始攀登。[……]在战争的火焰的映照下，攀登的路线似乎并未殊途同归，真正的主峰还相距遥远。[……]这样的人将是有能力建造新城的公民，在这样的人的头脑里，人们所说的五种基本知识将大放异彩。这五种基本知识是：天文学的基本知识，即承载我们的星球在其间运动的无边无际的宇宙的基本知识；地球的基本知识，即支配我们这个星球的物理、化学、电学等自然法则的基本知识；历史的基本知识，即我们已开始掌握其清单的60个世纪劳动积累的基本知识；

身体的基本知识，即人类机器的基本知识[……]；哲学的基本知识，即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曾一直使人类受着并将永远受着折磨的对理想、正义、光明、以及彼世的渴求的基本知识。”（《关于体力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及工人大学的组织的论文》，第 11 页）

他看问题的高度，他对有产者的质疑，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注意。“大多数人享有福利会使普遍的道德观念得到提高。少数人的奢侈则相反，会使之降低。[……]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民役’，这个词的含义模糊不清，更应该采用‘工役’一词，指在车间、工厂、工地进行一定时期的义务劳动。其期限与方式可视社会需要而定，但是其原则似应很快地就和现行的兵役原则一样不可变更。”（《欧洲向何处去》）直到最后，顾拜旦一直都在为此奋斗。他生前刊出的倒数第 2 篇文章的题目不就是“大学、体育和社会义务”吗？（《苏黎世瑞士大学学报》，1936 年 12 月）

正是在这里，体育和奥林匹克主义有了它们的位置，它们全部的位置。“无论是使用力量的习惯，还是进行协调的习惯，在我们的身上都不是生而有之、自发形成的。这需要学习和训练。[……]只有通过身体锻炼，这些品质才能深入到我们的习性之中并驻之长久。这也正是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的优越性。有节制的和超越极限的锻炼者都应进行有组织的体育活动。”（《奥林匹克书信》，《洛桑报》，1918 年 5 月 22 日）

顾拜旦所主张的奥林匹克主义远远超过单纯的身体完善。它的目标是这样一种个人的充分发展：个人正在实现着或至少正在坚持追求着对立面脆弱的平

衡。此后至为重要的是，给所有人以平等参与的可能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可能。这是他不断发展的思想所达到的顶峰。

皮埃尔·德·顾拜旦的观念开始具有最广泛的意义。“[……]1914年6月，我们似乎已经在庆祝[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潮了。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在又一次目睹它的成长。它还有一个参与人数的问题需要解决，只要这个问题存在，就不能说一切都已完美。昨天，无论有无此问题，都已做得足够好了，而现在，则还远远不够。[……]应该让产生欢愉、力量、平静和纯洁的肌体的快乐，以现代工业的完善所能赋予的多种多样的形式，遍及到最底层的人们中间。这才是我们正在奠定基础的完整而民主的奥林匹克主义。”（《纪念奥林匹克运动会25周年的讲话》，1919年，洛桑）因此，就像古代体育教馆应该成为“城市中的体育学校”一样，受市政当局支持的这种体育学校将成为生活的中心之一，“未来城市的基础”之一。

顾拜旦是始终活跃的思想家，是不知疲倦的奋斗者，他摆脱了俗世的大部分羁绊，无视生活的艰难曲折，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并非出于偶然。在1926年“全面教育联盟”主持的乌希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中（《文选》，1933年，第85页），他的思想便得到充分反映 [参阅：组织家]。

体育的权利和参与普通文化的权利

“每个人都拥有进行体育运动的权利，城市应该尽可能无偿地为成年公民提供必要的手段，使他们不必参加某个团体即可置身和经常

处于良好的体育环境之中。

因没有空闲时间或缺乏足够经济来源而无法参与高级精神生活的个人，可以指望城市能够保障他们与普通和公平的文化保持接触，使他们不仅了解这一领域，更能形成一种排除一切实用和职业考虑的整体观。”



II.问题的时代？

这个目光远大、心胸宽广的人道主义者，这个成为世界公民的爱国主义者，这个坚信多数人权利的贵族，难道是我们凭空臆造的？

自 1937 年 9 月 2 日，世界变了。对顾拜旦及其事业的看法和分析也发生了变化。起初，还只是一些陈词滥调重新翻将出来，一些流言蜚语不胫而走。现在还经常有人处于这一初级阶段。但是后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开始有人视而不见或偏颇地质疑他的贡献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再以后，便出现了彻底的质疑，那个睿智的革新者、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美好形象被抛到九霄云外，他只成了一个必须揭穿其假面具的最资产阶级的反动派。

对于这些指责和质疑，置之不理是否就是上策呢？诚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既不回避，也不充耳不闻，相反，应是予以充分了解，看一看对所提出的问题应做何回答，哪怕问题的提出是十分恶毒的。

这样做是因为，人们实在是太清楚了，20 世纪个人迷信的泛滥和骑士的滥竽充数使人们误入了怎样的歧途，以至于不能不接受对质。

首先，有人说人们想把顾拜旦塑造成一个在他所从事的一切事业中都取得成功的人，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甚至是无中生有，事情远非如此。正像谚语“本乡无先知”所说，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一直受到领导人士的猜疑，妒忌，甚至排斥。他在晚年的几页手稿中写道：“假如我当初预见到背叛、嫉妒、不光明磊落，我也许当时就会失去坚持下去的勇气，事实是我确实未预料到这一切，至少没想到会达到如此程度。”（伊夫·皮埃尔·布洛涅曾提及此稿 [参阅：《更好地了解顾拜旦丛书》]，国际奥委会有存档，但所有权归纳瓦塞尔家族。）

1894 年后，他一方面同意留任 USFSA(法国体育协会联合会)的秘书长，一方面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奥林匹克事业中去。但是，1898 年 11 月 USFSA 投票通

过决议：“只支持城市和国家的官方组织”。这无异于否认顾拜旦委托筹备 1900 年第 2 届巴黎奥运会的拉罗士富科私人委员会。三位在 1900 年 USFSA 年鉴中享有荣誉称号的人物，1891 年他推举获选的主席莱昂·德·让兹子爵、离群索居的儒尔·玛尔卡代和皮埃尔·德·顾拜旦本人，立即提出辞呈。后来当顾拜旦在 1907 年 1 月 13 日出版的《汽车》上宣布组建了一个“负责保障法国参加伦敦奥运会的”委员会时，出现了同样的反对运动。法国官方组织的体育运动对这样一个边缘人物所表现出的独立性感到非常恼火。正是为了与之抗衡，法国成立了全国体育委员会。一直等到 1914 年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庆典的举行，全国体育委员会和法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瑞斯蒂尼安·克拉里的态度才有某种程度的缓和。当时法国奥委会只是全国体育委员会的所属机构。后在 1924 年的第 8 届奥运会上，克拉里同样表现出缓和的态度。顾拜旦定居洛桑后，因地处遥远，已不大惹人恼怒，但同时也渐被遗忘。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惊异地发现，他 1929 年 1 月 22 日在爱丽舍宫受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尔格接见时，相关报导竟如此之少，如凤毛麟角。要知道，正是在此场合，亨利·德·巴耶-拉图尔在克拉里的陪同下，将一本有国际奥委会全体同事题词的、非常特殊的留言册赠给这位奥运会的复兴者。

人们并不那么惊奇地看到，编入他部分文章的《文选》是在他 70 周年诞辰之际，由希腊、瑞士、瑞典、埃及、葡萄牙和拉脱维亚诸奥林匹克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组织资助出版的。他收到来自世界不同首都的贺电，惟独没有收到巴黎和法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只言片语——他的心一定在为此滴血。

“他人的漠不关心和冷若冰霜使我感到痛苦。但是我始终没有怨恨之心。”他在私人日记中这样诉说。他并没想过将这些内容公诸世人。

这里应该提出另一种认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另一种想法。在他复兴奥运会的巨大成功之外，在他丰富的思想所关注的其他领域中，顾拜旦是否真正被“看重”呢？体育运动的领导者们，著名的教育家们，公认的历史学家们，即使不把他视为“门外汉”，难道就当真不认为他终究是在玩票？

他那西西弗式的著作，他那教育者的诲人不倦和不惜辛苦，真正产生影响了

吗？他没有正式的大学学位，他没有被纳入“正规的”机构和系统之中。必须承认，这使得他无法在这些领域中享有他应有的身份和位置——无论人们是否赞同他的立场。

此外，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现代性”（1986年）时，当人们从三个资料库出发探讨北美洲对顾拜旦及其思想的地位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时，结果发现这类研究几乎不存在。

他很快就赢得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和友谊，英国人如业余体育协会的秘书长查理·赫伯、库西-拉芬、后为德斯伯勒勋爵的格林费尔等人，美国人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米里根·斯朗以及费奥多尔·罗斯福等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是参加1896年雅典奥运会美国队的主体。他尽心竭力地促使大西洋彼岸进一步了解和赞赏现代法国。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得到回报。当现代体育正在对盎格鲁-萨克逊人歌功颂德和感恩戴德的时候，竟然是常常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的法国人中的一员，给了这个举世承认的重大赛事组织以持久存在的机会，盎格鲁-萨克逊人能不为此而心存芥蒂？正是出于此，有些人极力想证明顾拜旦的一切成就都应该归功于英国“强身派基督教徒”托马斯·于格。他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1853年；1875年译成法语）塑造出议事司铎查尔斯·金斯利这样一个人物，其原型即是1828年至1842年任拉比格公学校长的托马斯·阿诺德。另有一些人在煞费苦心证明他是“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做出贡献的一系列人中的最后一位，而非第一位”，甚至将他说成是剽窃者。还有一些人在为争夺语言优势地位而进行的激战中，千方百计地摆脱着奥运会创建者的影子，他的名字已经在现在的奥运会开幕式所采取的一切形式中消失。

但是，激奋的情绪和偏颇的态度无法动摇客观存在的事实。事实告诉我们，顾拜旦的高瞻远瞩，他的机智勇敢，以及他的坚忍不拔，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纳入正轨，并赋予它一个绝非幸存于一时的长久生命。一些历史学家，如《体育，一个文化的历史》（1984年）的作者查理德·蒙代尔，一些社会学家和

一些人类学家，如著名专著《这个伟大的象征》（1981）的作者麦克阿隆，以他们严谨的科学态度，超然于争论和派别之外，对那些至少是极端的言论予以了驳斥。

仅就体育领域而言，就总有一顶现成的帽子扣在顾拜旦的头上。人们说他是既狭隘又教条的“**业余体育**”的狂热而坚定的维护者。那些把他作为这样的人而大加讨伐和无情谴责的人们，不都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来了解他的吗？他们不都只是在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们根本不想辨明真伪的老生常谈吗？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甚嚣尘上，并不足为奇。像他这样的一个贵族，从拉芒什海峡的彼岸获得启示，想把体育变成一个教育工具，用以培养不存在金钱问题的社会阶级的青少年，这不正是送上门的典型人物吗？他岂不是正好被选作替罪羊而充当那些被唾弃的、过时的、注定招人讥笑的理念的一个化身吗？

那么，何以他的最后一部告白《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基础》没有谈及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便把精力用在了同谎言的斗争上。英国从1866年开始即已采用的“业余者”一词的定义，只是维护“绅士”的，不仅反对因体育而获得酬金的人，也反对工人、匠人、打短工的人。顾拜旦很快便远离了这样的定义。他本人固然不把体育看成一种职业，但也从未将这一点作为他的行动的主轴线。1925年他在布拉格的告别讲话中说：“先生们，如果以前我对业余体育这样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你们一定感到惊异。那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难以解决。[……]现在事情变得复杂多了，因为可贵的生活改变了许多因素，舆论已不准备再听任体育成为富人的消遣。[……]体育正在一个金钱的欲望可能会侵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中发展。体育协会应该做出榜样，回归对荣誉和真诚的崇尚。”

七年之后，他的《奥林匹克回忆录》的第十一章明确使用了“业余运动员的身份”这一标题。他开门见山，明明白白地说：“又是这个问题！总是这

个问题。[……]我现在可以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从未对这个问题有过多大的兴趣。[……]如今我已到了——甚至超过了从心所欲的年龄，我可以无所顾忌地承认我的这个观点了。[……]种姓集团的荣耀不应在体育运动中有任何表现，现在已不是可以要求运动员自付旅费和食宿费的时候了，业余运动员的资格与任一体育组织的规章风马牛不相及。[……]”

1936年9月，在他晚年的时候，当一位记者又问及此事时（《汽车》，9月4日），他动情地回答说：“人们经常而且总是错误地为奥林匹克宣誓的虚伪性而责备我。请你们读一读这个誓词吧，这个我有幸亲自制定并为之自豪的誓词吧！请你们看一看，又有哪个地方要求到奥林匹克运动场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具有一个绝对的业余运动员的身份？这种身份我第一个视为不可能。我只是透过宣誓要求一件事：体育的光明磊落。”在他早在1906年即已想到的宣誓中，他所注重的，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对精神的尊重。

后来，在尚且停留在体育范围内的批评之上，又加上了一层更加深刻的质疑。当对现存社会形态类型的否定遍及各个领域，无一得以幸免的时候，这样的质疑自当风行一时。体育比赛受到质疑，奥运会受到质疑。顾拜旦这次成为被质疑的标志性人物，遭到1968年五月风暴的儿女们和他们的竞争者的粗暴对待。这些人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否定一切既定秩序的第二代的那一套。

1981年，是让-玛丽·布罗姆将火力最强大的炮口对准了《奥林匹克的神话》（479页，1981年，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发起了毫不留情的攻击（第323-471页）：“顾拜旦的事业得到一致的称赞——只有少数例外，而这些例外也多在细枝末节上。[……]不止一个理由使我觉得这种一

致性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对顾拜旦一致表达的敬意，是混淆是非的蒙昧主义的敬意。之所以说是混淆是非，是因为他总被说成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可是他的著作和言论，在那些拜读过的人看来，却是令人瞠目地表现出鲜明的反动性：精英主义，性别歧视，‘开明的’种族主义，‘温和的’法西斯主义，对秩序、纪律、社会[……]等级的崇拜，对个人奋斗的吹捧，十足法国传统的殖民主义，禁欲的清教主义，对付工人的保守的父道主义，与文明没落的革命性前瞻针锋相对的保守主义，与利奥泰和 1936 年纳粹奥运会的组织者卡尔·迪姆的友谊，对希特勒的称赞，凡此种种，就是他的光荣！”这一连串的抨击发端于一篇题为《法西斯主义的两个面孔：顾拜旦和希特勒》的文章（作者是比尔纳·亚内，载于 1977 年 4 月《何谓主体》杂志）。这些抨击简直会让人发笑。但是，对这些尖刻的议论，愤怒而惶恐的顾拜旦的支持者们采取了全然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拒绝看到那些作者终究还是在追根溯源并研读了顾拜旦著作，甚至找到了他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文章，比如他在 1932 年为莫里斯·帕斯卡托尔的《刚果狩猎纪行》所写的前言，莫里斯·帕斯卡托尔是 1910 会议后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不管怎样，这种对顾拜旦的特殊解读毕竟成为一种流派，特别是在高竞技体育运动的对立派中间。与其耸耸肩，不屑一理，倒不如更直接的面对问题，了解端倪。这样是不是更好呢？

在一点上，总是跻身先驱者行列的顾拜旦确实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无法抹掉那些岁月的教育留给他的深刻印记。这一点就是对女子竞技体育运动的看法。他的观点没有随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是男孩的体育比赛[……]，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冒什么样的危险，那都会是充满生气的。如果体育比赛女性化，比赛就变成可怕的活动了。阿姆斯特丹的做法似乎为我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的态度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意

见，大部分都反对在第9届奥运会上再次出现女性参赛的场面。如果有哪个女子想踢足球或者进行拳击，由她好了，只要不当着观众的面就行。因为，聚在这种比赛周围的观众根本不是来观赏体育比赛的。”

（《瑞士体育》刊行的单行本，1928年11月）。用不着等左派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他只想把女性局限在献花和颁奖的可爱的角色中时，当他只是以极大的保留同意女性参加可能会引起对这些脆弱的女子说三道四的比赛时，他就是在顽固地将自己封闭在这个落后于时代的立场之上了。“我仍然认为，女子体育是不可提倡的，这类比赛必须从奥运会的比赛排除出去，奥运会是为了[成年男性]个人得到可贵和庄重的颂扬而恢复举行的。”（《纪念奥林匹克主义诞生40周年的讲话》，1934年）

顾拜旦的“殖民主义”的观念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这位维护“种族和国家原则上平等的人物实际上是在不断地主张实质上的不平等”，难道这些人说错了？他们援引了他对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召开的国际殖民社会学会议所做的评论：“大会给种族平等和绝对进步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这些理论挟革命而谬种流传，是造成那么多的过失和错误的真凶。”（《法国编年史》，第2册）。这里浸透着顾拜旦直言告白的殖民主义思想，这个爱国者的顾拜旦试图在对外扩张中为正在从1871年的溃败中崛起的第三共和国找到复兴之路。这番话却有令我们目瞪口呆之处。但是顾拜旦自己对中伤他的人作出了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到，明确他说话的准确时间，将引述他的话限定在他不断进步的思想的进程中，是何其重要。他在《奥林匹克回忆录》中回顾了这个问题，提到组织“非洲运动会”的失败。他曾在1923年罗马代表大会上当着维克多-埃马纽埃尔国王的面，宣布组织一个非洲运动会。原定1925年在阿尔及尔举行，后改为1927年在亚历山大举行，但是运动会始终没有开成。1929年，他就此对殖民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第128页）：“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根本的冲突，是殖民主义的思想在向解放土著的倾向发动进攻。在宗主国

高官们的眼里，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他还指出，他们“所采用的理论根据已属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他为非洲的黑人运动员们，为他深信有朝一日必将冲破一切障碍而组织起来的非洲体育，留下一个奖牌和一句拉丁语的题铭：“Athletae proplium est se ipsum nocere, ducere et vincere.（运动员的特质是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战胜自己。）”现在人们可以理解他所说的“体育是一切种族的特权”了（《奥林匹克回忆录》，第213页）。

顾拜旦没有反对过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没有反对过希特勒这个“怪人”。他感谢过这位预先提出“Wir sollen Bauen[我们要建设]”这一口号的帝国元首和他的“天才而热情的朋友卡尔·迪姆”。卡尔·迪姆就是那位开创了奥林匹亚圣火传递活动的人。顾拜旦1936年9月4日在《汽车》上发表的访谈中，谈到了他的一些感受：“在柏林，人们在为一种思想而激动，我们不能对这种思想进行评定，但是那种激奋之情是我一直在追求的。”难道仅凭此可以说顾拜旦是法西斯，是纳粹？难道仅凭此就应该把顾拜旦说成是一个独裁哲学和专制制度的支持者？独裁哲学和专制制度是奴役和捕杀人类，而顾拜旦全身心为之奋斗的毕生事业是促进人类的进步，两者是相互对立，背道而驰的。事实上，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不仅令人感到好笑，更令人无法接受。

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顾拜旦是否只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只是最大胆的、最矢志不渝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之一（布罗姆，第458页）呢？有人指责说，他这个希望“社会太平”的人的政治思想，将他置于那些以某种方式竭力维护既定社会的人之列。这是无视和否定他走过道路。1887年11月14日，当他在伦敦法国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宣布“勒普莱计划”时，他毫不迟疑地说：“不平等岂止是法则，就是事实！”同我们所有的人相比，他都并不更加是一个自发的自然产物。他的精神活动的土壤和起点，见诸许多作者的著作中。这些作者有奥古斯特·孔德、阿莱克西斯·德·托克维尔、伊波利特·泰纳、弗雷德里克·勒普莱、埃弥尔·迪尔凯姆等人。自从人们指责他并且一定要将他固定在那个狭隘的父道主义上之后，他又走了怎样的道路啊！1914年，他在纪念奥运会恢复20周

年的讲话中指出，“体育是民主的一种体现”。这发展了他的言论：“体育的发展令阶级战争支持者感到恼怒，而令那些希望由他们以更温和的手段给社会组织带来所希冀的变化的人们感到欢欣鼓舞。”（《体育与社会问题》，《奥林匹克评论》，1913年8月）他的话印证了他对革命动荡的厌恶，他认为这种震荡会使人类缓慢建立起的文明毁于一旦。先是在1919年，后是在1923年，他走得更远：“昨日的社会建筑在不公正之上。现在问题是要搞清楚这个社会是否本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否认不公正的基础，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批评与历史的篇章》，第7页）“必须[……]纠正这种千年的偏见，这种偏见将体力劳动置于相对智力和文化来说总是十分屈辱的地位。”（《欧洲向何处去？》）

后来他对有产者的利己主义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投入到了更加激烈的论战中去。他渐渐地从他出身的环境中摆脱出来，走上自己的道路，表现出不容置疑的心灵上的仁爱和精神上的宽宏，而这显然已不可能将他置于既得特权的维护者一方。



顾拜旦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

是一个法国人创立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奥运会相关文件的解释出现歧义时须以法语文本为准，这些都有时会难免让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酸溜溜的（参阅：下文）。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顾拜旦受到了他们怎样的影响，英国和美国给他树立了怎样的榜样，又使他得到怎样的借鉴。这里汇集了一些他对这个既相近又相远的文明的探讨和向往的相关资料。

1883 年 他可能是在 12 岁的时候（1875 年）读到托马斯·于格那部饶有趣味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并了解了拉格比公学的辉煌。稍后他又读了引人入胜的伊波利特·泰纳的《英国散记》（1869 年出版）。按照多纳尔德·安托尼（多年分管教育工作的英国奥委会委员）的说法，顾拜旦早在 1881 年就去过英国，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安托尼编写了一本简明扼要的小册子《精神、身体和灵魂》（1995 年），列有《英国奥林匹克遗产一览表》，还特别列了一个题为《顾拜旦、英国和英国人》的年表。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上面提到的年份的后两年，他从勒阿弗尔出发，前去探望了当时正在位于温莎附近的布蒙中学就读的一些朋友。这位穿越英吉利海峡的 20 岁青年，在出发时对英国人几乎未抱任何宽容之心。但是看到的现实，却令他大为震动并深感兴趣，以至于成为他的教育的信条。他决心将这个信条引入法国的教育体系中，用以革新陈旧不堪和故步自封的法国教育 [参阅：教育家和青年益友]。

1888 年 自 1886 年起，他的活动和第一批文章，都是在大力宣扬从事体育活动的重要性，清楚反映出他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见闻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集中而系统表述他的思想的、准确而详细记述他曲折旅途各阶段经历的，还是他以游记形式撰写的著作《英国教育（中学与大学）》。他用犀利的目光和批评的精神探访了许

多地方：伊登公学（他在这里见到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划艇选手的安普希尔“船长”）、哈罗公学、拉格比公学、惠灵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莫尔伯勒公学、库博山公学（以培养工程师为主）、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基督医院、埃德格巴斯顿（伯明翰）天主教学校、奥斯库特天主教学校、布蒙耶稣会学校（1883年7月）、奥古斯塔堡（苏格兰北部内斯湖附近）的斯托尼赫斯特耶稣会学校、牛津大学（1884年8月、1886年11月和1887年6月）、剑桥大学（1886年5-6月）、国王学校（考古学家查尔斯·瓦特德斯坦亲自领他参观）、都柏林大学（1886年11月）、爱丁堡大学、以及汤因比服务所。这个在伦敦极为贫困的怀特教堂街区为劳动阶级建立的服务所，给他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这一年，亨利小镇的船赛及其赛事组织的方式，引起他的极大兴趣。5年后，当法国的几个赛艇队被允许参加比赛时，他兴高采烈地出现在了赛场上。

1889年

正如我们我们所知（参阅：体育人），他加入了“英式”体育的首批法国倡导者之列，并将他称之为“法国的英式教育”的最初研究成果汇集成书，重新付梓出版，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个人影响。他还以通讯的方式对大英帝国和北美洲的学校进行了调查，回应相当踊跃，特别是威廉·彭尼·布鲁克斯博士给了他详细的答复。这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开端，也为他的分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依据。6月15日，他在向巴黎国际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对他的这些分析和研究做了一个总结 [参阅：组织家]。

9月，顾拜旦再次从勒阿弗尔起航远行，他在执行公共教育部长1889年7月17日签发的命令：“着该员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大、中学，并实地研究两国青年成立的体育协会的组织 and 运作情况。”此行后，他一回到法国便出版了新作《大西

洋彼岸的大学》，讲述了他的考察情况和观感。在秋冬连续几个月的漫漫旅程中，他的足迹遍布：普林斯顿大学（由他的朋友威廉·米利根·斯朗陪同）、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西点军校、哈佛大学、韦尔兹利女校、波士顿基督教青年会、阿默斯特大学、格罗敦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克尔大学、魁北克拉瓦尔大学、渥太华大学（英国天主教学校）、多伦多大学，还有“从北至南”的克内尔大学、安哈伯大学（密歇根）、芝加哥大学、圣路易大学、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弗吉尼亚州大学、佛罗里达州图兰大学（新奥尔良）、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列克星敦大学、华盛顿大学（天主教学校）、乔治敦大学、约翰斯·雷普金斯大学（巴尔的摩）、以及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他描述了在耶鲁大学举行的一场普林斯顿大学队对伯克利大学队的橄榄球比赛所造成的轰动，他当时正从费城经纽约到达这里，准备去普林斯顿参加在技术学院召开的“体质教育大会”。他的实地观察和他参加的各种会议的讨论坚定了他的选择：刻板的“德国式”体操“体系”，温文尔雅的瑞典式锻炼方法，都不可能像这些自由民主的年轻人所进行的体育运动和锻炼这样，产生如此有益的成果。

**1890 年
至
1894 年**

此阶段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在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样式酝酿和成型的过渡时期，顾拜旦经常以拉芒什海峡和大西洋的彼岸的所作所为为榜样。1890 年 10 月顾拜旦在温洛克受到布鲁克斯博士异常友好的接待[参阅：奥林匹克人]，他后来在纽约《评论杂志》上对布鲁克斯博士表达了由衷的敬意。他促成了罗斯林·帕克橄榄球队 **1892 年 4 月 18 日** 的法国之行。这支球队在勒瓦鲁瓦的球场上给法国场地俱乐部的年轻球员们“上了一课”（12 比零，5 次达阵）。他率领了不同比赛项目的法国队到英国访问比赛。他还理所当然地提请了安普西尔爵士（英国）和威廉·M·斯朗出任首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委员。在他 **1893 年**和 **1894 年**交替之时

访问美洲期间，他同威廉·M·斯朗的友情进一步加深。他在《美洲和希腊回忆录》（183页，1897年）第一部分中谈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还提到，他的1896年的又一次美洲之行令他耳目一新，他对新大陆的活力和胸怀感慨万端，书中也谈到芝加哥和“世界博览会”。**1893年10月9日**，在作家保尔·布尔热和“山姆大叔”波兹的陪同下，他在体育俱乐部的顶层平台上观看了博览会的开幕典礼。他认为，这次博览会最终确保了美国在南北战争20年后的统一。他乘坐“南太平洋铁路”的普尔曼式卧铺车厢，从纽约前往圣弗朗西斯科，途经圣科罗拉多州（丹弗尔）、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最后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横越了美国西部，历时35天。他对蒙特雷、圣巴巴拉和圣弗朗西斯科（它的奥林匹克俱乐部、音乐会和体操）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对大学一直予以特别的关注，如斯坦福大学（帕洛阿尔托）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克兰附近），同时对里克天文馆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顾拜旦参加了普林斯顿大学于**1896年9月**举办的150周年校庆，详尽谈到这个学校给他的印象，谈到它美丽的校园，谈到“校友”对母校的支持，还有各种体育比赛。他在书中宣告，自1895年，他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新奥尔良大学和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设立了三个奖项，奖励关于法国现代政治的年度辩论会的优胜者。这本书最后着落在年轻的泰罗·德·阿尔贝里真心实意地在纽约创办的“流浪者使团”（参阅：下文）。顾拜旦与盎格鲁-萨克逊的世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还表现在文字交往上，他在英语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用英语撰写的文章，出版过许多由他本人或由别人从法语译过来的英语著作，如先于1897年在纽约-波士顿、后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的《第三共和国时代法国的演变》等，也出版过直接用英语写的著作，如《1814年后的法国》，1900年在伦敦出版，281页，汇编了1899年他在《半月评论》上发表的文章。

最令人称道的是他与切尔滕姆学校校长库西-拉芬大人所建立的友谊。他们的友谊始于 1897 年勒阿弗尔奥林匹克代表大会，此后发挥了巨大作用。1904 年奥运会艰难地由芝加哥转移到圣路易举行，1908 年伦敦奥运会的举办，1932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很早就授予了洛山矶，这些都是奥林匹克主义史的组成部分 [参阅：奥林匹克人]。

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他的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1900 年《法国编年史》**第一卷的前言。他曾在 1906 年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 [参阅：历史学家]：“七年前，当我访问我以前曾经访问过的美国的大学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法国思想的影响正在显著衰退。人们渐渐不再问津法国所进行的研究，不再阅读法国人的著作，并且正在形成一种法国知识界已经衰败的想法。[……]辩论会一类的社团组织对于法国的事情漠不关心。我当时想出了一个主意，设立了一些奖项，激励那些对法国友好的辩论者关注法国。”这些奖章刻有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以巴斯德、托克维尔、卡诺等名人命名，在哈佛、约翰斯·霍普金和伯特利诸大学均有设置。正是为了向竞赛者 [客观而公正地] 介绍法国政治、社会、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思想和事件的确切进展情况，顾拜旦推出了这部编年史。他最初想用英语出版，因为他编写此书的初衷是让外国人了解法国，“只顺便供法国人阅读”。但是当他得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要求的时候，为了在国际大学界广泛引起对法国的关注并为法国赢得同情，他最终还是决定先用法语出版这本著作，如有可能，日后再用多种语言出版。他认为法语是当时使用最广、最“被普遍

接受的”语言。

后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顾拜旦力不从心，无暇再顾及这些奖项，1931年曾决定取消向伯克利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们颁奖。他这样做并未影响人们对他的确切看法：他对美国精神的理解是深入而积极的。

他在大西洋彼岸所看到的并极力介绍给他的同胞们的，如同他**1898年4月18日**在巴黎政治科学学校所讲授的《美国历史的哲学》的课程，巩固并加强了他对中学和诸多英国精神元素的认识。他不断地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些源泉中汲取体育方面、更确切地说是奥林匹克主义方面以及教育方面的有益成分。

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英语地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希望重新评价皮埃尔·德·顾拜旦在奥林匹克事业中的地位，例如**彼得·C·麦克英托什**在他的暗示性著作《**体育与社会**》（C·A·瓦茨出版公司，第1、90-93、188页）中，就是这样做的。也是出于同一目的，约翰·卢卡斯曾竭力证明强身派基督教的先期性，而他的同胞戴维·C·杨则证明，从1833年帕纳约蒂斯·苏特索斯创作诗歌，到埃万耶洛斯·扎帕斯资助体育活动，包括英国积极介入以及布鲁克斯博士做出巨大努力，种种与奥林匹克事业相应的创举早在并不具有“独创思想”的顾拜旦之前即已出现。但是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实：流行世界的国际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相关计划是顾拜旦制定的。布鲁克斯曾在写给顾拜旦的最后一些书信中，对他的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比自己所主张的永久固定在希腊定期举行奥运会的想法更胜一筹。

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费尔南·朗德里曾致力于调查北美高等教育界对顾拜旦及奥林匹克运动的研究情况。**约翰·J·麦克阿隆**的著

作《这个伟大的人——皮埃尔·德·顾拜旦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起源》（359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实事求是地对奥运会革新者的其人其事进行了初步总结。多那尔德·安托尼的分析指明了此书意义之所在：“这是关于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最重要的英语文献。这个对他一生的探讨建筑在深入而富有启示性的研究之上。他青年时代的文化环境，他所接受的教育，他的海外游历和他对国际主义的一往情深，托马斯·阿诺德（拉格比公学）和威廉·彭尼·布鲁克斯（马奇·温洛克公学）对他的影响，凡此种种，无不在研究之列。他的复兴奥林匹克主义和奥运会的梦想的发展，他的深层哲学，他的目标和目的，全都经过人类学的分析。奥林匹克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教育，必将为通读过这部著作的人们所充分理解。”



不胜枚举的语录中的三则

何其多的想法，何其多或多或少得以实现或未能实现的创意，何其多胜负难定的战斗……

我们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些表现其为人行事的警句。

“生活是简单的，因为斗争是简单的。勇敢的斗士会后退，但是不会畏缩；会让步，但是不会放弃[……]。生活是孤独的，因为斗争是孤独的[……]。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斗争是美好的[……]，这是追求真理、光明和正义的精神斗争。” [《归顺记》，1902年版，第321-322页]

“奋斗是至高的快乐。成功不是目的，而是更上一层楼的手段。个人只有在与人类相联系时才有价值[……]。” [《世界主义》，1897年3月版(?)第5卷，后收入1933年版《文选》]

“高瞻远瞩，直言不讳，雷厉风行”，此为皮埃尔·德·顾拜旦在他的藏书签上题写的三个词。

我们知道，他的藏书在1944年5月19日星期五和20日星期日这两天由洛桑书业公会公开拍卖，随即散落四方。

在他生前，人们很难见到他的著作，它们无声无息地摆在书架上，无人问津，几近湮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惟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赫然存世，而这也有人误解，只视之为竞技而已。

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这位身材不高的人已以高大的形象载入史册，当然是体育的史册，但也是争取更好的人类环境的思想以及为之而不懈奋斗的史册。

他的思想，即使有时是“反潮流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必将发扬光大。难道不该对此坚信不移吗？1920年，在安得卫普奥运会上，皮埃尔·德·顾拜旦所构思的现代奥运会闭幕式正式闭幕词的原始版本首次采用，正如其中所说的，他所坚持的思想必将“跨越时代，为一个日益热情、日益勇敢、日益纯洁的人类争得利益”。他衷心“希望这一切如愿以偿”。

了解顾拜旦

他有哪些重要著作？

有哪些组织致力于促进对他的事业及其现实性的了解？

A. 通过其著作了解顾拜旦

通过直接阅读其著作了解顾拜旦，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做法。但是，曾几何时，他的著作已经变得几乎无法找到了，那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自 1986 年后，开始出现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达到了何种程度？

如有可能，或求诸图书馆，或见诸他处，可先读他的三本书。前两本是自传体著述，第三本包括有他所涉足的极为广泛的各个领域的内容。书目如下：

《二十一载体育奋斗》（1887 年-1908 年）

220 页，体育教育出版社，1909 年

《奥林匹克回忆录》

219 页，国际体育教育署出版，1932 年

《文选》

184 页，保尔·鲁博出版社刊印，1933 年

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法国总共只再版了两本书！书目如下：

《体育教育》

157 页，VRIN，1972 年

此书为 1934 年“新版”的重版，加上了乔治·里乌的前言。

《运动心理学论文集》

200 页，杰罗姆·米隆出版社，1992 年

1913 年洛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从 1906 年开始在《奥林匹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被汇编成集，由 PAYOT 出版社付梓出版。负责选编、编排并撰写了 1913 年版导言的，是顾拜旦的一个勤勉而谦逊的年轻合作者：罗杰·德帕涅亚。在此版本中，罗杰·德帕涅亚的导言由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里乌撰写的前言取代：“[……]显然，我非常喜欢德·顾拜旦先生那些如此鲜活和如此大胆的惊俗骇世之论。”

日久天长，时过境迁，寻根溯源已变得几乎不可能，特别是找寻他从 1886 年到 1937 年在世界十几中报刊上分散发表的短文、文章和其他文字，更是难上加难。

为此，还应该转向德国，并向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的卡尔·迪姆研究院表示感谢。1966 年，这个研究院在其成立两周年之际，作为第一部出版物，用三种文字（德语、英语和法语）出版了书名为《奥林匹克思想》的顾拜旦文集，汇编了他从 1892 年 10 月 25 日到 1936 年所发表的讲演和论述，全书共 149 页。法国人应该感到欣慰，莱茵河彼岸将这样一个版本奉献给了他们。书中难免有印刷错误，但是至少有 47 篇文章从此变得真正意义上的“可读”了。

当然，为这本有丽泽洛特·迪姆夫人之撰写导言的文集所做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不完全排除另有用意。这种推测很快便得到证实。几个月后，出版了版式完全相同的第二本书《卡尔·迪姆：奥林匹克思想》……尽管如此，这在当时毕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举动。

在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出版机构准备出他的书，甚至没有任何研究者准备将他浩繁的文章加以整理、出版。如果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为此而感到悲哀的话，那么整个法国都应该谦恭而真诚地、排除任何杂念地对卡尔·迪姆研究院给予赞扬。因为，正是在这里，围绕着他们所尽心竭力搜集到的顾拜旦的文章，形成了

一个坚强的研究核心。正是在这里，由国际奥委会负责的、得到胡安·安东尼·萨马兰奇支持的出版鸿篇巨制的顾拜旦文集的宏大计划得以实现。文集于 1986 年面世。这应该归功于一个工作小组，特别应该归功于协调编纂工作和进行研究指导的诺伯特·米勒，他得到了奥托·尚茨的协助。法国的乔治·里乌教授以盎然的青春朝气担负起“教育顾问”的职责，并为题为《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文集第一册撰写了导言。

文集

第一册 启示录.....	666 页
第二册 奥林匹克主义.....	760 页
第三册 体育实践.....	836 页

这部著作通过可靠而科学的参考系，通过词目索引和主题索引，将顾拜旦的大量文章提供给读者选择。这些“巧妙的”分类和编排原则，像其他一切编制的体例一样，或会有主观成分，有值得商榷之处，使人查阅时并不像最初所想象的那么方便，而这终究无关宏旨。这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巨著其实只会引起人们的一种遗憾：所汇集出版的 2000 页文章仅占他全部著作的七分之一。那未出版的余下部分又将会怎样呢？

B. 著作目录

顾拜旦生前，人们只是在为他编纂《文选》的时候编制了一个《文章、著作、讲演和讲座目录》，14 页，由保尔·鲁博出版社于 1933 年刊印。

此后一直等到上面提到的《奥林匹克思想》一书出版的时候，卡尔·迪姆研究院才随书附加了一份 8 页纸按年序排列的著作目录，有 226 目，包括一些手写的书信。目录编制时间为 1966 年。

国际奥委会以上述工作成果为基础，整理出版了《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著作目录》，278目，国际奥委会刊行，1968年。

前法国场地运动协会领导人、《我知道什么》丛书中的《体育史》的作者、埋头苦干的研究者贝尔纳·吉莱，根据个人研究的成果，整理出一份新的著作目录，比原来的扩大了许多的。但是他这本油印的目录并未广泛发行。《皮埃尔·德·顾拜旦著作目录》，625目，贝尔纳·吉莱刊印，1971年。

伊夫-皮埃尔·布洛涅在卡恩大学答辩的论文中（见下），援引了这个目录，并附加了他自己的新发现：《新发现的未发表文章》（第395页-396页）和《著作名录》（第397页-439页），见《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生平与教育事业》，LEMEAC出版社（渥太华），1975年出版。

在奥托·尚茨的支持下，诺伯特·米勒以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文集》（见上）的编纂过程中，跨越了决定性的阶段，极大丰富了文献目录的内容，最终编制出《皮埃尔·德·顾拜旦著作目录》，175页，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出版，1991年。由于他们的努力，人们现已掌握了业经验证的文献工具。据作者说，该目录涵盖了顾拜旦95%的作品。

这本集十几年艰辛研究和考证之大成的作品纲目，几近完整。若有新的研究成果，还将补入。无疑还会有意外的惊喜，但是可以料定，那将只是对现以确定的目录的补充。

C. 对顾拜旦生平及其事业的研究

这里只涉及法语的研究成果，英语的相关著作已在前面提及 [参阅：顾拜旦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

研究顾拜旦的著作在他生前只见到过一部，从他逝世直至1980年，也总共

只有 3 部。这反映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长期不被理解，甚至受到漠视。而就是这屈指可数的几本著作，也良莠不齐，视角各异。以下是各书简介，可略见一斑。找到这些书相对容易，因为只有这么几本书。

埃内斯特·塞莱尔：《皮埃尔·德·顾拜旦，法国力量的支持者》，160 页，迪迪埃出版社，1917 年。这是政治和伦理科学院院士塞莱尔撰写的第一部关于顾拜旦的专著。仅题目就表现出，这种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极为特殊的背景所进行的研究和探讨，采取了怎样的视角和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

一直等到近 40 年之后，当与顾拜旦相关的书籍已从书店消失了很久的时候，当新生代已不再掌握任何相关的材料而处于文献荒漠之中的时候，才又出现了新书：**安德烈·瑟内和罗贝尔·埃勒维**两位作家合著的传记《**德·顾拜旦先生**》，191 页，S.E.S 出版社，巴黎，1956 年。这本书扼要介绍了顾拜旦生平经纬，有一个详细的大事年表和一个作品目录，爱德华·埃里奥为此书写了简短前言。应该说，此书来的很是时候，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但是，抛开某些错误不提，其研究方法未免有些令人失望，大部分引语未注明出处。

玛丽-泰蕾兹·埃康：《皮埃尔·德·顾拜旦，奥林匹克诗史》，300 页，卡尔曼·勒维出版社，1966 年。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的第一部关于顾拜旦的大型传记。本书拭去岁月的尘垢，清晰地复活了顾拜旦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他的丰功伟绩和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他和他的一生可能抱有的偏见和狭隘看法。这是青年和体育国务秘书在筹备错后一年举行的顾拜旦 100 周年诞辰的官方庆祝活动完成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业绩。传记作者以其横溢的才华重现了顾拜旦的生活，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经历的时代。作者会见了无数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追寻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根源。她还从以前从未有人参照过的出版物中找出材料，令人信服地证实，这位男爵和他的委员会曾一直遭受到来自法国体育领导人士与日俱增的敌意，他和他的委员会的权威只是由自身的努力而建立。这本书或有令人感到缺憾之处，玛丽-泰蕾兹·埃康毕竟是在写一部文学性著作。出于文学色彩的需要，她将一些有所发挥或有创作成分的材料同一些准确的引语混杂起来，而且在许多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引语上只标注了“未发表的手稿”，

令研究者们尽管确信出处可靠但仍有望梅解渴之感。总之，同真正的论述性学术专著相比，本书更具传记性。

伊夫-皮埃尔·布洛涅：《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生平与事业》，484页，LEMEAC出版社（渥太华），1975年。在蒙特利尔第21届现代夏季奥运会的前一年，伊夫-皮埃尔·布洛涅在加拿大找到出版社将他在冈大学答辩的博士论文付梓出版。这部论作结构严谨，论据充分，文中穿插的引言均标有明确出处。因为布洛涅与滨海圣玛格丽特有些渊源，所以他对顾拜旦1914年以前在米尔维尔的数次停留都有精彩的描述，并且挖掘出像《科地评论》这样一些不为人知的出版物。这部著作还是一部附有详细注释的不可多得的学术参考书。不论从哪方面讲，这本有理有据的专著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成功，首先是因为作者非常善于引证顾拜旦的思想赖以形成的文化环境；再就是，作者无论从哪个侧面展现顾拜旦的事业，都始终围绕着这一主轴：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教育志向。

此后十年零几个月，到了1986年，这是至为重要的一年。10月，国际奥委会召开会议确定巴塞罗那和阿尔贝维尔分别为第25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同时出版了三册本的《文集》（见上文）。书盒中插有一本小册子，名为《皮埃尔·德·顾拜旦生平图片集》，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编，96页，国际奥委会印发，1986年。这本图册刊印了玛丽·德·玛德尔（顾拜旦的妹妹）的两个孙子之一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长期搜集并精心编排的照片。

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还将保罗·德·顾拜旦1930年被迫卖掉的米尔维尔城堡和土地恢复为家族遗产。《皮埃尔·德·顾拜旦生平图片集》汇集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其中一些照片在当时已属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此外，从5月18日到20日，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以顾拜旦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洛桑大学举行，多达50余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议。而这已经是他逝世后的第49个年头了！几个月之后，由于梅斯安大学教授诺伯特·米勒的努力和效率，出版了论文

集《顾拜旦的现实性》，313页，诺伯特·米勒主编，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国际奥委会出版，1986年。此举可以使人再次看到，在对顾拜旦的整体学术研究方面，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感谢诺伯特·米勒。这本文集汇编了关于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奥林匹克主义、政治学、美学等学科的16次会议所发表的法语和英语论文及其相关评论，极富教益，清楚地展现了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看待顾拜旦的思想的。

还应该提及传记《皮埃尔·德·顾拜旦》273页，路易·卡尔巴著，法雅尔出版社，1988年。这位作者路易·卡尔巴曾在1986年《文集》出版时受德·纳瓦塞尔之托请进行校核。他在书中大量援引了所能接触到的顾拜旦的著述，用整整8章复述了已基本为人所知的材料。不管怎样，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传记，特别是书中提到了顾拜旦的青春岁月，例如他对梵蒂冈主教会议城、1869年的罗马的清晰记忆，书中还对政治科学学校的“思想大师”阿尔贝·索雷尔、阿纳托尔和保尔·勒罗伊-伯里奥等人有所评论。

克里斯蒂安·吉里萨1992年3月在洛桑大学文学院发表的硕士论文付印刊发，名为《皮埃尔·德·顾拜旦时代洛桑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1894年-1939年)》，221页。论文对洛桑市和国际奥委会的档案材料进行了精心研究和处理，堪称缜密而精确的历史研究的范本。论文对顾拜旦长期计划的远大性和他直接行动的即时性之间所形成的明显矛盾——所有在困境中进行斗争的人所遇到的矛盾，对他人生最后20几年所处的鲜为人知的物质环境，特别是对他从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退下来之后所处的物质环境，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篇论作为试图超越前人的研究者开了先河。

帕特里斯·肖雷：《皮埃尔·德·顾拜旦，第二次改革运动》，256页，国际奥委会（《历史与现实》丛书），1996年。洛桑国际奥委会的合作者，萨瓦的研究者肖雷在这本严肃的著作中非常注重利用别人尚未使用过的原始材料。作者首先论述了“折中教育”结构中的社会问题——几乎是从根上产生的严重问题，然后着重谈到顾拜旦晚年的生活情况，即1915年之后和定居瑞士

之后的生活情况，特别是充分而清楚地展现了顾拜旦为争取国际劳工局的积极支持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与阿尔贝·托马斯（卒于 1932 年）的交往。书中的附录也同样清楚而确切，如所附保尔·瓦莱里所领导的地中海大学中心的课程表，上面清清楚楚地列出了顾拜旦 1934 年 2 月 28 日和 3 月 1 日两次所做的关于“奥林匹克主义”的讲座。与对吉里埃隆的分析一样，新的光亮投射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年代，而在那些年代生活的顾拜旦始终抱有坚持不懈的勇气和永不放弃的希望。

我们看到，上面列举的法语著作不足十本，作者屈指可数。但是，如果这本《真实的顾拜旦》超出自行限定的范围，还想提及一些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小册子的作者，甚而提及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著作的作者，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可提及者会很多。

在扩大的范围内，应该提到：

路易·梅兰、弗朗西斯-马里尤斯·梅塞尔和奥托·梅耶三位瑞士人，路易·梅兰著有两本小册子，一为 1941 年撰写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全面人道主义》，一为 1944 年撰写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顾拜旦》。

- 国际奥林匹克学院自 1961 年于奥林匹亚举办的历届培训班中发表演讲的诸位讲演人
- **勒内·马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在 1963 年 10 月 28 日国际体质与体育教育理事会（CIEPS）为纪念顾拜旦百年诞辰主持召开的巴黎国际会议上，他曾发表致词，颂扬顾拜旦的具有延续性和现实性的指导思想。（见 1964 年第 1 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讯》）
- 就笔者个人而言，我会提到：

让·迪里：《奥林匹克主义与教育》，20 页，附注释，世界运动科学代表大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摘要见《体质与体育教育》，第 135 期，1975 年 9 月-10 月号）；

让·迪里：《德·顾拜旦所进行的战斗》（皮埃尔·阿尔诺主编、1981年 PRIVAT 出版社出版《运动中的身体》一书第八章）；

让·迪里：《皮埃尔·德·顾拜旦，活着的人》（1989年2月10日在索邦大学向公众所做的关于《文集》的介绍，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刊印，1989年）；

让·迪里：《奥林匹克主义的诞生》（罗纳尔德·绪布舍尔、J·迪里、贝尔纳·热和阿尔芒·科林等人所著《运动中的历史》一书第6章，1992年）；

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的七位委员，伊夫-皮埃尔·布洛涅、让-弗朗索瓦·布里松、J·迪里、雅克·马尔尚、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让·布拉克和让罗·当弗塞尔，他们分别撰写文章，共14篇，加上内尔松·帕依乌里所写的前言，汇编成书《更好地了解皮埃尔·德·顾拜旦》。

D. 围绕顾拜旦

为使长期孤军奋战的顾拜旦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不同的社团组织相继成立，力量日益壮大，数量日见其多。其中两个团体被公认为资格最老。

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

1950年8月12日，阿尔弗雷德·罗西埃、让-弗朗索瓦·布里松、皮埃尔·罗斯蒂尼等人创立“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omité Perre de Coubertin）”。初由保尔·夏依耶-贝尔教授担任主席，以后出任主席的相继为亨利·布尔杜·德·丰特内、路易·邦当、维尔弗里德·博姆加特内、路易·邦当（再次出任）、阿尔弗雷德·罗西埃、皮埃尔·孔德-奥方巴克。在皮埃尔·孔德-奥方巴克任内，委员会被称为“法兰西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omité Perre de Coubertin France）”。

皮埃尔·孔德-奥方巴克1990年11月30日逝世之后，委员会的三个创始人

之一、法国大学体育运动的推动者之一，皮埃尔·罗斯蒂尼众望所归，自 1991 年 6 月 17 日开始担任由 24 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主席。

现名为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Comité français de Pierre de Coubertin）的宗旨是：促进对他的整个事业的了解，从中得到借鉴用以推广其教益；推进体育运动和户外体育活动的发展；遵循顾拜旦的理想，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倡议。

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透过其理念、出版物和各种小册子，在继承和发展顾拜旦的事业和思想上发挥了并正在发挥一定的作用。委员会以不断研讨顾拜旦的事业和思想为己任。

地址：

MAISON DU SPORT FRANÇAISE（法国体育之家）

1 Avenue Pierre de COUBERTIN（顾拜旦大街 1 号）

75640 PARIS-CEDEX 13-FRANCE（法国巴黎邮编 75640）

Téléphone: (33) 1.40.78.28.00（电话）

FAX: (33) 1.40.78.29.51（传真）

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

顾拜旦的事业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因此一些瑞士和法国的人士 1978 年在洛桑提出创立“国际委员会”的倡议，希望能够使这些从顾拜旦的事业的源泉中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方式的活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

国际委员会的主席首任是 1924 年 800 米赛跑银牌获得者、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保尔·马尔丹（瑞士），继任是顾拜旦的甥孙若弗鲁瓦·德·纳瓦塞尔·德·顾拜旦（法国），再后是西班牙奥林匹克学院院长孔拉多·杜兰特（西班牙）。

2002 年，美茵茨古登堡大学体育史教授诺伯特·米勒博士（德国）接任了国

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的主席一职。米勒教授因编译出版顾拜旦的作品而享有盛誉。1986年，法语三卷本《顾拜旦选集》问世；2003年，国际奥委会在洛桑发行了英语版的《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2008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的《顾拜旦文选》。

本书的作者让·迪里自2002年起担任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副主席。

自1997年起，在国际奥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在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皮埃尔·德·顾拜旦中学”中间，发起了国际中学生交流会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北京四中也成为了“皮埃尔·德·顾拜旦中学”的一员。

1997年，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创设了顾拜旦成就奖章。拥有体育和艺术才能、具备顾拜旦以及奥林匹克主义理论知识并且热心社会活动的全面发展的中学生，可以荣获该奖章。

该委员会的基本宗旨是研究、推广和促进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全面的人道主义”，与致力于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发掘顾拜旦文化遗产的各个国家的和国际的组织通力合作。委员会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十分密切，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是其名誉主席。

委员会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斐然，刊发了大量出版物，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并参加多种活动——参与《文集》出版，主办研讨会，编制参考文献名录等。

如需详细资料，请与国际皮埃尔·德·顾拜旦委员会联系。

我们的地址是：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CIPC)

General Secretary: Prof. Jean-Loup Chappelet

Postbox 397

CH -1001 Lausanne

Mail to: jean-loup.chappelet@idheap.unil.ch

Website : www.Coubertin.ch; www.Coubertin.net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生前所汇集的档案材料的当然集中地，是有关这位创始人的原始文献中心。

地址：

COMITE INTERNATIONAL OLYMPIQUE（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Château de VIDY（维地城堡), Postbox 356

CH-1001 LAUSANNE Suisse（1001 瑞士洛桑）

Téléphone: (41) 21.621.61 11（电话）

Fax: (41) 21.621.62.16（传真）

www.olympic.org

奥林匹克博物馆，1993年6月23日开馆。这一天是奥林匹克运动现代化革新宣告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成立99周年纪念日。博物馆的展厅向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收藏了许多曾属于他的私人物品。

地址：

MUSEE OLYMPIQUE（奥林匹克博物馆）

1, Quai d'OUCHY（乌希河沿路1号）Postbox 1121

CH 1001 LAUSANNE Suisse（1001 瑞士洛桑）

Téléphone: (41) 21.621.65.11（电话）

Fax : (41) 21.621.65.12（传真）

www.olympic.org

当然，肯定还有大量无法估量的宝贵文献资料存世，特别是在顾拜旦家族不同分支的后人手中。

除洛桑外，**科隆体育学院**也收藏了许多相关资料。

在已是世界公民而始终以拳拳之心眷恋着祖国的这位海外游子的故里，有一所**青年和体育部之体育司所属的国家体育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许多文稿和资料，希望能为顾拜旦的事业和思想发扬光大而大力做出贡献。

博物馆地址：

95, Avenue de France

FR-75650 PARIS Cedex 13（巴黎，吉尔布少校大街 24 号,75650）

Tel.（电话）：(33.1) 40.45.90.00

Fax（传真）：(33.1) 40.45.92.92

www.jeunesse-sports.gouv.fr